



金融与发展

2019年3月号

冰岛的成功秘诀

第12页

对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的采访

第30页

高科技人才争夺战

第46页

A large,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s head profile in silhouette. The interior of the head is filled with a lush, vibrant garden scene. It features various green leaves, white daisies with yellow centers, pink flowers, and a monarch butterfly. Green vines with heart-shaped leaves and curly tendrils climb up the sides of the head.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beige color with a subtle, repeating pattern of small, stylized floral or leaf motifs.

女性与增长

目 录



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63%，但女性花在无报酬劳动上的时间却是男性的3倍。

女性和增长

- 4 全球的当务之急
赋予妇女权利对于世界经济和民众而言至关重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 6 消除性别差距
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我们的预期
埃拉·达布拉-诺里斯、卡尔帕纳·科赫哈
- 12 建立包容性经济
冰岛总理探讨性别对于重新思考经济意义
卡特琳·雅各布斯多蒂尔
- 14 女性在印度的创业之路
女性努力冲破她们创业道路上的重重障碍
阿什林·马修
- 18 投资性别多样性
在整个投资界，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公司都在努力提高各级管理层的性别多样性
拉吉·库马尔
- 20 无偿照护工作的隐性成本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应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性别平等
莎拉·甘米奇、纳兹哈·萨尔塔纳、玛侬·木兰
- 24 银行业要为女性的未来提供服务
数字金融服务正在取代中间人，实现机会平等
莎拉·亨德里克斯
- 26 日本的性别差距
职业机会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工作时长使两性间的工资差异无法消除
三口一男



本期还有

- 36 一切往事，皆为序章**
古罗马的教训表明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安东尼·阿内特、约翰·列普斯基
- 42 公民身份与经济增长**
包容性公民法往往能促进经济发展
帕特里克·埃米尔·伊玛目、康尼·波达尔
- 46 高科技人才争夺战**
世界各国对有限的高科技人才的争夺日趋白热化
佩德罗·尼古拉西·达科斯塔
- 52 让人捉摸不透的增长预测**
随着巨大的技术变革不断推进，为什么长期增长预测却变得越发悲观？
M.艾汉·高斯、弗朗西斯卡·奥恩佐格、菅原直孝



其他内容

- 30 经济学人物**
阶层分析家
克里斯·威利兹采访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知名学者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 34 前沿**
实施稳健的政策
埃尔韦拉·纳比乌丽娜解释了大胆的政策行动
如何帮助俄罗斯避免了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 40 回归基础**
最低工资是否能让工人受益？
过高的工资可能促使雇主裁员
皮亚蓬·索德里维波、加布里埃尔·苏鲁尔
- 50 图表释义**
差距明显
女性在很多领域仍然落后于男性，尤其是在科技领域，这种不平等更是显著
李丽军
- 57 书评**
《万亿之舞：发展中国家与全球金融》
戴维·鲁宾
《非洲各国的税收状况：强制、改革及发展》
米克·穆尔、威尔逊·普里查德、
奥德-黑尔格·菲耶尔斯塔德
- 60 货币**
值得被铭记的女性
新版10元加币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格伦·戈特斯里格





人人平等

如果你是一名女性，那么你可能不得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没有权利，你不仅会被歧视，而且还可能很难获得成为一名高效率工作者所需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因此很难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而没有这样的高效率女性从事一份好的工作，将对潜在产出造成巨大损失。

直到最近，很多国家仍然认为性别错误是不重要的。但是，如今一股新的势力正在崛起，那就是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为女性赋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还具有经济意义。尽管如此，进展依旧缓慢。政治宣言毫无意义，除非其背后有关于获得教育、可负担的儿童保育以及劳动力市场等相关措施的支撑。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使得女性仍然是照护者的角色。即使是在主张平等的冰岛，也需要采取坚实的行动，以落实其总理卡特琳·雅库布多蒂尔 (Katrín Jakobsdóttir) 所说的“性别平等的社会基础设施”。

人很容易绝望。然而，微小的改变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为印度妇女提供种子资本和培训已经使很多人打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数字金融服务显示出巨大的前景。在华尔街，机构投资者道富银行 (State Street) 呼吁让那些董事会中没有女性参与的公司出局，这已促使四分之一的没有女性参与的董事会行动了起来。

勇敢的年轻女性，如捍卫女孩受教育权利的马拉拉·尤萨法扎伊 (Malala Yousafzai)，以及敢于让金融界精英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格里塔·腾伯格 (Greta Thunberg)，给了我们希望，下一代将强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赋予她们权力。这个世界需要女性。 **FD**

卡米拉·伦德·安德森 (CAMILLA LUND ANDERSEN)，主编



本期封面

如今，全世界都发现女性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有利于女性。本期《金融与发展》探讨了女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共生关系。插画师迈克尔·瓦拉克萨 (Michael Waraksa) 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将其展现在本期杂志的封面上。

主编：
Camilla Lund Andersen

执行编辑：
Maureen Burke

高级编辑：
Glenn Gottselig
Natalie Ramírez-Djumená
Chris Wellisz

助理编辑：
Marie Boursiquot
Bruce Edwards

数字编辑：
Rahim Kanani

在线编辑：
Lijun Li

生产经理：
Niccole Braynen-Kimani

文字编辑：
Lucy Morales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Celine Allard
Bas Bakker
Steven Barnett
Nicoletta Batini
Helge Berger
Paul Cashin
Luis Cubeddu
Alfredo Cuevas
Rupa Duttgupta

Thomas Helbling
Laura Kodres
Tommaso Mancini Griffoli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Christian Mumssen
İnci Ötör
Catriona Purfield
Uma Ramakrishnan
Abdelhak Senhadi
Alison Stuart

©20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版权所有。
如需翻印本刊文章，可通过填写在线表格 (www.imf.org/external/terms.htm)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opyright@imf.org 进行申请。如用于商业用途，可通过版权税计算中心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www.copyright.com) 获得授权，并支付一定的象征性费用。

本刊的文章和其他资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订阅服务、地址变更和其他广告事宜，请联系：
IMF Publication Services
Finance & Development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 USA
Telephone: (202) 623-7430
Fax: (202) 623-7201
E-mail: publications@imf.org

《金融与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季刊 (地址: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大厦
电话: 010-88190916
传真: 010-88190916
邮政编码: 100142
网址: <http://cfeph.cfemg.cn>
英文版刊号: ISSN 0145-1707
中文版刊号: ISSN 0256-2561





巴西：繁荣、衰退与复兴之路

“是什么阻碍了1981年后巴西的经济增长？本书很及时地对那之后的巴西经济进行了一次令人大开眼界的调查，综合了多篇论文的精彩分析：为支持更有意义和更具前瞻性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

——ELIANA CARDOSO，塔夫茨大学弗莱切法律与外交学院前教授





全球的当务之急

赋予妇女权利对于世界经济和民众而言至关重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借此机会，我们反思人类为争取更大的性别平等所进行的斗争。这项一年一度的活动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然而它所倡导的尊重妇女和为妇女提供机会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妇女面临的问题包括从性骚扰和暴力到不平等的法律和职场中的不公平对待，此外还经常面临就业不足、薪资偏低和缺少晋升机会等问题。

不平等或不公平的待遇可能会使妇女边缘化，阻碍她们作为积极的社会成员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然而，当我在思考众多组织和个人为确保妇女享有平等机会而发挥重要作用时，我也认识到决策者在其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制定各项积极政策，帮助妇女和女孩更容易获得所需的各种资源，以过上好日子，包括教育、医疗服务、交通安全、针对性骚扰的法律保护措施、资金以及灵活的工作安排。

IMF 建议其成员国实施这些政策措施，同时与各国政府通力合作，研究这些政策对妇女的影响。近年来，我们更加重视增强妇女权力的问题。除了重要的伦理方面的考虑之外，还因为赋权妇女是在努力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包容性增长（这些都是 IMF 的强项）过程中错失的一个机遇。

例如，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妇女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那么各国经济就会更具弹性，经济增长也会更快。我们最新的估算表明，在有关性别不平等的样本中，如果排名靠后的国家能消除就业中的性别差距，那么其 GDP 的平均增幅可达 35%，其中 7—8 个百分点是由于性别多样性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在确保董事会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的高管团队或董事会每增加一位女性成员，那么其资产收益就会提高 8—13 个基点。如果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能提高担任高管职位的女性所占的比例，那么银行业也就会实现更稳定的发展。

IMF 的 189 个成员国面临很多不同的挑战，但对于所有的关注公平和多样性的成员国而言，赋权妇女仍是一种共同的问题，也是全球亟待解决的问题，影响着生产率和更加包容的社会和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大家都将受益匪浅。FD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是 IMF 总裁。

消除 性别差距

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
经济效益超过我们的预期

埃拉·达布拉-诺里斯、卡尔帕纳·科赫哈



作为女孩子，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要相信我们无所不能，世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对于很多女性来说，现实并不能达到她们期望的高度。我们两个人都成长于印度相对保守的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环境中，并不存在完全的平等。我们认为性别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关社会公正的问题，但在开始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经济问题。

女性几乎占世界大约 50 亿劳动适龄人口的一半。但仅有大约 50% 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力队伍之中，而男性的这一比例高达 80%。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较低，而且在非正式行业中，带薪工作的女性比例偏低。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发

性别差距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假设，男性和女性在出生时拥有相同的潜力，但由于两性在教育、医疗、经济、科技、法律权利以及社会和文化因素方面的差异，使女性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反过来，女性面对的这些障碍导致雇主可选择的人才储备减少 (Kochhar, Jain-Chandra, and Newiak, 2017)，结果造成生产力下降和经济增速放缓。据估算，女性的经济赋权的缺失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在发达经济体中占 GDP 的 10%，而在南亚、中东和北非等地区则占到 GDP 的 30% 以上。

最近的研究表明，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经济效益超出了我们以前的估计。这是因为女性和男性可能具有相同的潜力，

如果女性在那些被自动化技术替代风险较大的工作中的占比过大，那么旨在提高女性带薪工作的人数并缩小两性工资差距的政策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展中经济体。在那里，针对雇主的法规较少，因此工人更容易遭受工资较低、失业等不公待遇。而且，即使在正式行业中，与男同事相比，接受过相同教育的女员工的工资也较低。由于女性的带薪工作时间较短，所以她们年老时领到的养老金也较少，从而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在那些参加工作的女性当中，很少有人能做到高管职位或是创办自己的企业。女性在家里也承担着更多的无报酬劳动，包括照顾孩子和干家务活。这些因素可能限制了她们从事带薪工作的机会，并且面临就业面狭窄的局面。

IMF 的研究表明，两性间不平等的竞争环境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IMF 早期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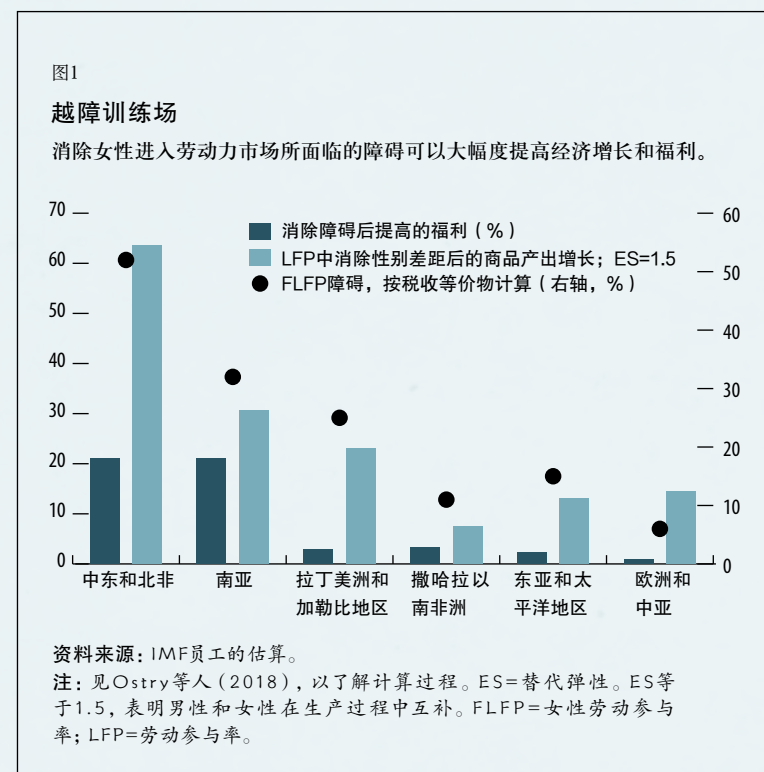
但就经济价值而言，他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技能和想法 (Ostry and others, 2018)。性别差异可能体现了社会规范及其如何影响成长过程、社会互动、风险偏好以及对激励措施的响应。例如，多项研究发现女性更厌恶风险，这说明她们更害怕失败，竞争力更弱。女性的警惕心强，这也有不少好处：那些董事会成员的性别比例基本相同的公司的业绩更好，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银行业监管机构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也与更好的金融稳定性有关 (Sahay and Čihák, 2018)。同样，那些女性董事占比较大的银行拥有更强的资本缓冲、更低的不良贷款比例、更强的抗压能力。

这可能是因为更多的女性任职管理岗位有利于提高思想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

依托宏观经济、行业和企业数据，IMF 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 (Ostry and others, 2018) 表明，由于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技能和视角，包括对于风险和协作的不同态度，所以他们在职场中有着互补作用。因此，鼓励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积极作用超出了我们以前的估计，甚至超过了仅靠增加员工人数而实现的成果。在那些两性劳动力参与率差距最大的国家，如果消除这种差距，将平均使其 GDP 增加 35%。其中，五分之四的增幅来自鼓励更多工人进入劳动力队伍，但五分之一的增幅来自通过增加性别多样性所实现的生产力的提升。这项研究还说明，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会大幅度提高经济福利，带来消费品、家庭生产和空闲时间的变化。在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这些方面的增幅超过了 20% (见图 1)。

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当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男性也将从中受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女性的补充性技能提高了生产力，从而使得每个人的工资增加。当更多工作者竞争工作岗位时，人们可能会存在工资下降的预期，但上述生产力的提高足以弥补工资的下降，而且使工资有所增加。

但只是鼓励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是不够的。对于女性在千变万化的劳动力市场中所面临的挑战，IMF 最近的一次调查为世人敲响了警钟 (Brussevich and others, 2018)。数字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正在吞噬那些乏味的、重复性的工作，而使那些需要管理和认知技能的工作变得更 valuable。如果女性在被自动化技术替代风险较大的工作中的占比过大，那么旨在提高女性带薪工作的人数并消除两性工资差距的政策所带来的来之不易的好处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殆尽。的确，这



项研究发现，尽管各国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所有行业和职业中，女性从事重复性工作的人数都更多。

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40岁以上的女性以及从事低技能文员和销售岗位的女性而言，失业风险非常高。而且，无论行业和职业，女性从事技术替代风险较低的职位和管理岗位的人数占比都较低。从全球范围来看，女性在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董事会中所占席位不足 20% (Sahay and Čihák, 2018)，女性银行首席执行官的占比不足 2%。在飞速发展的高科技领域，与男性相比，女性成为经理和专业人员的几率要低 15%，而成为文员和服务性人员的几率却高出 19%。(见图 2)。

考虑到科技发展的现状，这项研究估计，20 年内 30 个国家 28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以及塞浦路斯和新加坡) 中的 2600 万位女性的

通过劳动力市场中旨在提高技能、在工作者与岗位之间建立纽带关系以及促进就业创造的政策来确保对失业女性和男性提供同样的支持将至关重要。

工作岗位被科技进步取代的可能性将超过 70%。从全球范围来看，这表明有 1.8 亿女性存在失去工作的风险。虽然更多的男性工作岗位存在被自动化技术取代的风险，但失业女性人数在女性劳动力队伍中的占比更大。

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性别不平等存在多面性，目前尚无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最有效的政策方法也因国而异，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当前的性别差异、新科技影响经济的速度。这里有三方面需要重点强调。

首先，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的政策：我们发现各种体制、法律、监管和财政政策杠杆在鼓励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之中。虽然目前尚无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法，但是这些政策在努力创造机会、消除障碍。那些能帮助女性更轻松地协调好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政策和基础设施尤其能发挥积极作用。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该：

- **投资基础设施。**例如，在南非的农村地区，电气化使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了 9%。在印度，建设足够的卫生设施缩小了两性在教育和劳动力参与率方面的差距。墨西哥推出了专供女性乘坐的公交车，从而确保她们的乘车安全。

- **通过提高融资的便利度来支持女企业家。**女性经常面临更严苛的贷款抵押要求、更短的贷款期限、更高的贷款利率（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关乎女性未来的银行业务”）。像马来西亚的女企业家融资计划以及智利的简化存款账户这样的举措都有利于缩小两性在贷款利率上的差距。

- **促进女性享有平等权利。**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有关遗产和财产权的法律。马拉维、纳米比亚和秘鲁都修订了本国的法律体制，以减少性别歧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这三个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将不断提高。

发达经济体应该：

- **推动产假和陪产假间更大的平等。**在瑞典，这项政策帮助母亲更快地回到工作岗位，改变了育儿方面潜在的性别角色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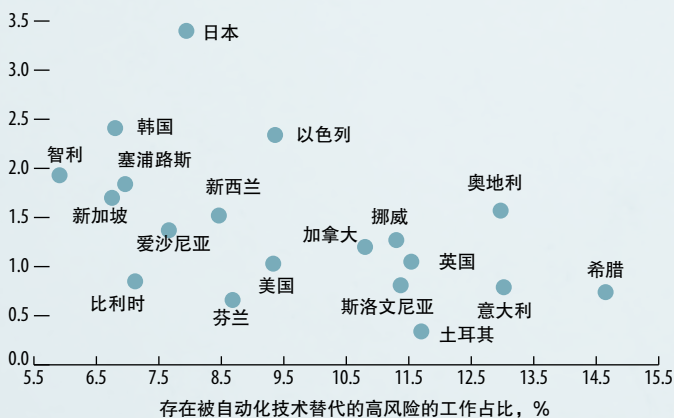
- **确保更多的民众获得价格合理、高质量的育儿服务。**例如，日本将育儿假的补贴额度从占工资的 50% 提高到 67%。研究表明，如果将育儿成本降低一半，那么劳动力市场中年轻母亲的人数将会增加 10%。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对具体的税收政策更为敏感，包括那些

图2

人类，机器人

各国在男性和女性在工作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风险方面的差异巨大。

（存在被自动化取代高风险的女性工作岗位和男性工作岗位的数量之比）



资料来源：IMF员工的估算。

注：见Ostry等人（2018），以了解计算过程。

不处罚次要收入者（大部分仍为女性）的政策，而用个人所得税取代家庭所得税。目前，加拿大、意大利和瑞典都推行了这种政策。实践证明，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减税政策也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就业率。其原因是：减税能降低税务负担并增加女性的税后收入，从而使女性能更积极地进入或留在职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美国的所得税退税政策，以及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退税和收入支付转移相结合的政策。

其次，培训女性掌握必要技能并向职场中的女性赋权的政策：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投资方面实现两性平等，这样才能保证女性能获得高质量的工作。例如，IMF 的研究表明，如果印度各邦将教育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提高 1%，那么女性劳动参与率便会提高 2 个百分点。增强个人技能成为女性避免工作岗位被高科技取代的最有效手段，也可使女性在新的工作机会中获益。

对于已经身在职场的女性而言，一些财政工具，如荷兰针对女性培训活动的减税政策以及法国移动个人学习账户，都能消除终生学习的障碍。多国还考虑通过专项工资税和公共拨款为私营企业提供的培训进行补贴。各方应齐心协力，通过为企业制定相关的招聘和人才留任目标，以及像挪威那样确定提拔配额、开展指导和培训计划等形式，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能升迁到管理和领导职位的机会。

数字技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两性在数字技术的使用方面一直存在很大的差距。全球 60% 的人口，大部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妇女，仍无法使用互联网；女性比男性上网的人数少 2.5 亿。公共和私营投资对于支持技术应用和消除两性在数字化方面的差距至关重要。例如，芬兰采取的确保宽带连接的普遍接入、全民数字教育、企业和政府服务的数字接入等方面的举措是消除两性在数字领域差距的综合性

的方法。

再次，帮助失业者顺利度过过渡期：鉴于女性面临着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技术所替代的极高风险，通过劳动力市场中旨在提高技能、在工作者与岗位之间建立纽带关系以及促进就业创造的政策来确保对失业的女性和男性提供同样的支持将至关重要。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还应适应更灵活的工作形式，如远程办公。为了解决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收入安全每况愈下的问题，有些发达经济体可能会考虑扩大无须员工缴款的养老金范围，并推行基本收入保障金。

近十年来，尽管各国在确保经济机会的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目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好消息是，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目前，决策者、政府和企业认识到向女性提供平等机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诸多好处。他们正在努力完善该领域内的政策和实践。IMF 一直致力于与其他国际组织、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合作，通过提供政策建议和分析，减少性别平等面临的障碍。FD

埃拉·达布拉-诺里斯（Era Dabla-Norris）是IMF 财政事务部处长，卡尔帕纳·科赫哈（Kalpana Kochhar）是IMF 人力资源部主任。

参考文献：

- Brusевич, Mariya, Era Dabla-Norris, Christine Kamunge, Pooja Karnane, Salma Khalid, and Kalpana Kochhar. 2018. "Gender,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8/0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Kochhar, Kalpana, Sonali Jain-Chandra, and Monique Newiak, eds. 2017. *Women,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Ostry, Jonathan D., Jorge Alvarez, Raphael Espinoza, and Chris Papageorgiou. 2018. "Economic Gains from Gender Inclusion: New Mechanisms, New Evidenc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8/0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Sahay, Ratna, and Martin Čihák. 2018. "Women in Finance: A Case for Closing Gap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8/0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建立包容性经济

冰岛总理探讨性别对于重新思考经济的意义



照片由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ICELAND提供。

在评判经济成败时，各国政府正慢慢将重点从最初的 GDP 驱动的衡量标准转向以幸福感为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渐进式政策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很多决策者正在分析冰岛，这个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是如何将性别平等作为其国内和对外政策的核心。

在冰岛，争取妇女平等的运动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将妇女从几百年来一直压迫她们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包括有关妇女的性自由和生育自由的立法变革、强有力的性别平等法规、公司董事会的性别配额。

但是，从传统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还需要采

取相应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这一昂贵的成本阻碍了很多政府实施这些政策。这里探讨的主要话题是全民保育和共同育儿假。如果实施得当的话，这些政策有望调整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构成及游戏规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政策能使女性参与劳动力和公共决策活动，同时也为男性提供了分担家务的机会。然而，这些有利于家庭的政策未获得应有的支持。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政策不过是给肆意挥霍公共支出敞开了一扇大门。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在 50 年前曾说，GDP 可以衡量一切，但生活的意义除外。他说得很有道理。然而，经济学仍将重点放在可测量的要素上，把政府支出划分成两大类：费用和投资。这种二元论将实体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资金归为投资类别，因此认为值得投入公共资金。另一方面，社会基础设施被列为费用或经营成本，被认为是应率先被削减的部分。然而，从我们出生（甚至在出生前）到死亡，这些都是支撑社会的结构，并创造了让生活富有意义的条件。

有趣的是，诸如公路、隧道和大楼等实体基础设施通常是男人就业的平台，而妇女经常会在社会基础设施相关的服务领域就业，如教育、保育和医疗。通过关注实体基础设施，而将社会基础设施放在一旁，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的社会要想繁荣和发展，这两种基础设施都不可或缺。如果离开了高质量的教育，一幢学校大楼能有什么价值呢？如果离开了

医务工作者，一幢医院大楼能有什么价值呢？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文盲阻碍了社会流动性，那么公路或隧道的价值又何在呢？

从这个狭隘的视角来看，全民保育和共同育儿假被人们视为奢侈品，而不是经济取得成功的基本特征，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事实上对于建立一个人人能兴旺发展的社会而言，它们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生活在 21 世纪（这是一个同性恋解放和妇女解放的世纪）的人比生活在上个世纪的人懂得更多的话，那应该是他们知道将人们从那些事先设定好的社会标准和结构中解脱出来的好处。

有些国家能提供价格合理的保育服务，而有些国家的妇女却必须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类国家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存在很大差异。在保育费用较高的国家，低收入群体的母亲根本无法出外工作。诚然，文化变迁使很多家庭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由男人养家的模式，但是两性间的收入差距将继续促使男人外出工作，妇女则留在家中。只要在我们的社会架构中，妇女为了照顾家庭而需要离开职场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这种收入差距就会像以往一样难以消除。

近几十年来，北欧各国出台了共同育儿假计划。这些计划为父母（包括同性父母和养父母）提供了具体的“用进废退”选项。在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支持下，冰岛模式为每个父母提供为期三个月的产假，另外还有三个月的产假可由父母双方自行划分共用。我国政府将进一步扩大这一计划的适用范围。除此之外，还将开展更为广泛的工作，以期弥合育婴假与由政府资助的高质量日托服务之间的时间缺口，因为后者的服务对象是两岁以上的幼儿。目前，这种差距大部分都是由那些得到财政补贴的保育员来弥补的。

现在的这种模式已经从 2000 年开始分阶段实施。除全民保育之外，这种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冰岛社会的转型。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如今，很多家庭将父母的义务和

关爱视为父母双方应平等分担的责任。父亲与子女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雇主以前常找的借口，如妇女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不能雇用或提拔她们，现在根本讲不通了。就我个人而言，要不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爱家庭的政策，我不可能既当总理，又当三个可爱男孩的母亲。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冰岛已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呢？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两性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在存在严重性别隔离的劳动力市场，女性从事的工作仍有价值被低估、薪酬过低等问题。我们尚未努力去根除暴力和骚扰。与世界各地的儿童一样，我们的孩子仍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困扰。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接近 80%，比男性 87% 的劳动参与率略低一些，但仍大致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确定的男性平均水平。所有民众（无论性别）广泛参与经济活动是冰岛经济的一大特点。在冰岛，失业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仅为 2.9%。

从社会公正和经济角度来看，对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包容和解放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正是冰岛目前参加“福利经济政府”集团的众多原因之一。该集团致力于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内，实现全民可持续发展和福祉。

性别平等是这一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别平等不会自动实现。它离不开意识形态上的远见、政治角力，以及政府、企业和社会集团的共同努力。妇女和少数群体的解放仍是当今政坛急需完成的任务之一。我们必须大力推动渐进式的经济政策，打破人们有关成本和收益的成见，同时将性别平等作为前瞻性社会公正议程的组成部分，不断推进两性平等。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将成为评价我们的标准。FD

卡特琳·雅各布斯多蒂尔（KATRÍN JAKOBSDÓTTIR）是冰岛总理。



女性在印度的 创业之路

女性努力冲破她们创业道路上的重重障碍

阿什林·马修

由于获得曼德西基金会提供的贷款，鲁瓦利·辛德得以扩大自己的家族生意。



12岁那年，拉希卡·巴布罗·辛德 (Radhika Baburao Shinde) 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她被家人送去与丈夫一同生活。她的丈夫是一名卡车司机，家位于孟买西南 330 公里处的萨塔拉区，这里位置偏僻，经常遭遇旱灾。辛德离开了学校，在丈夫的家庭农场当起了工人。

在辛德有了孩子（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后，她希望孩子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据估计，在印度农村，8.33 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3.2 美元。照顾孩子并保证孩子有足够的食物的责任通常会落在像辛德这样的妇女身上。

2014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帮助她打破了贫困循环。曼德西基金会 (Mann Deshi Foundation，该基金会为农村妇女传

授商业技巧，而且向她们提供贷款) 的员工来到他们村，为他们提供各种行业培训，但只象征性地收一点培训费。辛德学完了 120 个小时的裁缝培训课程，掌握了做小生意所需要的技能。这样一来，她除了做农活以外，还能做做生意来满足邻里乡亲的需要。这样能让她每月赚 5 美元，这些钱可以用在孩子身上。在中等家庭收入不如 70 美元的地区，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然而，她的公婆并不高兴。他们不希望她因为新买卖而无法专心干好农活。

“我们为此没少吵架。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辛德回忆道。

劳动参与率

由女性管理的曼德西基金会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印度少数几个努力消除女性创业时面临的社会、法律和经济困难的组织之一。尽管印度发展很快，但经济领域中两性间的严重不平等一直根深蒂固，结果造成人力潜力的大量浪费，使这个世界第二大的人口大国在减少贫困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恐怕最能说明印度女性困境的一个标志是劳动参与率。2017 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 27%，约为男性的三分之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印度在 131 个国家中劳动参与率排名第 120 位。女企业家的情况也不理想。2014 年开展的第六次经济普查发现，仅有大约 14% 的印度女性拥有或经营着企业。在由女性经营的企业中，超过 90% 的企业是小微企业，大约 79% 的企业是自筹资金。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业务的副总裁安妮特·狄克逊 (Annette Dixon) 在去年 3 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女性对印度 GDP 的贡献仅 17%，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据她估算，如果有一半的印度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印度经济每年将增长 1.5 个百分点，达到近 9%。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按四个衡量指标对 149 个国家进行了排名，包括经济参与度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政治赋权（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图表释义”）。印度排在第 108 位，在健康和生存以及经济参与度这两个标准上的得分非常低。

不难理解，印度在创业指数方面的表现也较差。在 2018 年万事达女性创业者指数中，印度在 57 个国家中排在第 52 位，排名高于伊朗，但低于突尼斯。该指数分析了融资渠道、发

展成果和营商便利程度等指标。

“由于印度社会的传统观念是女性必须将照顾家庭作为她们的主要责任，因此经常遭到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和反对。”女性创业与赋权(WEE)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阿帕娜·萨拉奥吉(Aparna Saraogi)说，“而且，缺乏育儿支持制度也让妇女们犹豫不决。”

缺少抵押品

女性创业还面临其他困难。印度女性很少拥有自己的财产，因此无申请创业贷款的抵押物。一般来说，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她们的收入也低于男性同事，而且她们通常在农业和服务业，往往是非正式经济中从事低技能工作。

对于那些需要资金来开办企业(无论是规模多小的企业)的有抱负的企业家来说，无法获得平等的融资机会是她们面临的一大难题。IMF 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弥合印度的性别差距：提高女性融资机会会有意义吗？”表明，在鼓励女性创业的过程中，提供平等的融资机会能提高GDP，降低失业率。这项研究发现，如果印度能简化其过于复杂的市场法规，并提高妇女的技能，那么可能带来最大的收益——GDP可提升6.8%。

社区平台SHEROES的创始人赛丽·查哈尔(Sairee Chahal)说：“在未来30年里，如果我们的经济要保持年均9%—10%的增幅，就必须建立一个支持各类女企业家的生态系统。”(SHEROES是一个帮助女性通过电话或使用应用程序联系顾问的社区平台。)

该组织帮助过多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萨提亚·桑达里(Sathiya Sundari)，她生活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南部地区。当摆脱了受虐的婚姻关系之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她向SHEROES求助，该组织帮助她创办了一家美容院。

“我当时并不清楚经营一家企业需要些什么。”她回忆道，“SHEROES安排导师培训和指导

我，还发起了一项众筹活动，帮助我开办了这项业务。”2017年，这项众筹活动在短短六天时间里就筹到了她需要的资金。如今，她的美容院每个月能赚大约8000卢比(113美元)，在结婚旺季(12月—3月)，月收入能达到15000卢比，超过了泰米尔纳德邦农村地区家庭月收入中位数(7269卢比)。

教育的不平等是另一大问题。印度女性的识字率为64%，而男性的识字率为82%。那些识字率较高的邦拥有更多的女企业家，这并非巧合。包括印度最南部的四个邦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内的地区的识字率要高于印度的平均水平。根据第六次经济普查结果，在这些地区，女性创办的小型工业企业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然而，即使在印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当中，女企业家也面临着性别歧视。梅克纳·萨拉奥吉(Meghna Saraogi)生活在新德里，是城市精英群体中的一员。她运营一个时尚应用程序StyleDotMe。该程序的用户可上传自己的照片，然后试穿各种服装，并实时得到其他用户的反馈意见。她回忆了自己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科技界寻求创业资金时的艰辛历程。

“很多人会问，要是我结婚，生孩子，那企业该怎么办？”她说，“还有人担心，一个女性创办的企业能否真得找到投资者的青睐。”

最终，在2016年和2017年，她通过印度天使投资网络公司(IAN)完成了两轮融资，总计32.3万美元。去年，StyleDotMe推出了珠宝的互动增强现实平台MirrAR。

梅克纳·萨拉奥吉的成功本应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现实并非如此。IAN的联合创始人和总裁帕德马加·鲁帕雷尔(Padmaja Ruparel)说，在该基金支持的130多个初创企业中，仅有大约1/4的企业是由女性创立的。鲁帕雷尔说，在他们每年审核的一万笔交易中，不足1/3的交易是由女性发起的。

“女性现在需要的不是政策或法规的调整，而是有更好的话语权和观念的转变。”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的总裁戴加尼·高希(Debjani

Ghosh) 说,“印度必须不断发展,并认识到无需担心女性具有与男性相同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然而,科技领域目前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例如,IAN 发现女性投入所占的比例从四年前的 10% 增长到如今的 30%。高希说:“投资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关注的是创意的价值,而不是初创人的性别。”

女性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参与率较低,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正式和非正式的障碍难以消除。截至 2017 年 1 月,印度政府部长级职位中仅有 19% 是女性,议员中仅有 12% 是女性。在各国议会联盟调查过的 193 个司法管辖区中,印度排在第 148 位。

“印度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通过有效的司法架构来支持女性赋权。”WEE 基金会的阿帕娜·萨拉奥吉说,“印度应有效地消除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

曼德西基金会的创始人查特娜·辛哈 (Chetna Sinha) 表示,女性经常缺乏挖掘机会的知识和技

她手下有五名女员工。她的家庭月收入已经提高到 281 美元。这笔收入足以保证她的女儿能学习工程课程。

阿帕娜·萨拉奥吉表示,WEE 基金会根据印度各地申请者的情况,向科技初创企业和非科技初创企业免费提供为期六个月的创业指导计划。这项计划的资金由印度科技部提供。

她说:“自 2016 年起,我们已经为 500 多家由女性创办的企业提供了指导,帮助 5000 多名女性掌握一定的技能,让其可以自食其力。”

印度的某些职业培训计划仍然偏爱男性。作为一项政府支持的计划,“印度技能”计划教会男青年掌握水暖工、泥瓦工和电焊工的技能,但女性课程集中在美容、健康和厨艺方面,但却根本没有培训女企业家的课程。

像拉希卡·巴布罗·辛德这样的妇女曾经经历了意想不到的事业上的转变。在曼德西基金会的帮助下,她又开了一家布料店,希望能扩大自己的裁缝生意。接着,由于曼德西基金会的顾问告诉她学一门畜牧方面的课程会让她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她在当地农业研究所学了一门为期六天的免

即使在印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当中,女企业家也面临着性别歧视。

能。为了在消除这种差距方面出一份力,该基金会设立了针对女企业家的求助热线,同时组织了师友计划。此外,它还开办了移动商业学校、妇女银行和社区广播站。

辛哈说:“我们的计划将重点加强融资渠道和资金控制。我们使女性参与进来并根据她们的需要进行相应的培训。”

参加该基金培训计划的人中就包括鲁瓦利·辛德 (Rupali Shinde)。14 岁那年,她嫁到了一个拥有制造皮革用品的小企业的家庭。这个家庭每月的收入是 56 美元,难以支付两个孩子的上学费用。为了扩大生意,她从曼德西银行贷款 1405 美元,但她缺乏使生意成功的专业知识。银行顾问鼓励她读一年商业课程。

她说:“我掌握了一些财经和数字技术方面的知识。他们帮助我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目前,

费畜牧课程。

“我一回来就去邻居家查看他们养的山羊,向他们介绍人工授精和声波图。我免费给 100 只山羊进行了授精。当这些山羊生下健康的小羊后,人们就开始信任我了。然后,我也就接到了附近村子里的电话。”如今,她每个月的收入接近 8000 卢比。她希望能攒些钱,将来供 16 岁的女儿上大学。

像辛德这样的企业家正在为下一代女性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她们不仅努力确保自己的女儿能获得将来创业所必需的教育,而且还为整个社会树立了行为典范,让印度女性看到自己能拥有的更美好未来。FD

阿什林·马修 (Ashilin Mathew) 是新德里《国民先驱报》的新闻编辑。

投资性别多样性

在整个投资界，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公司都在努力提高各级管理层的性别多样性

拉吉·库马尔

照片由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提供。



过去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提高性别多样性会对企业业绩和经济增长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是投资者非常看重的一家机构。MSCI发现，与那些董事会里无大量女性成员的公司相比，董事会拥有强大的女领导的公司实现的股本回报率要高出36.4%。

出于经济和社会原因，投资者对于如何鼓励公司董事会、高管层以及其他管理层中的性别多样性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为了支持这项工作，道富（State Street）以及其他不同规模的资产管理公司正在开发全新的工具，以使投资者有能力在其投资的所有公司内促进性别多样性。

2017年3月，我们将“无畏女孩”雕像树立在纽约金融区的核心地带。在我们努力提高人们对于企业领导层中性别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过程中，这个雕像无疑成为我们这项工作的“代言人”。然而，这项活动的意义远不止提高人们的意识这样简单。

作为股东，我们在公司董事会的股东人选及

其他重要事务上拥有投票权。借助于这种代理投票机制，我们投票反对任何提名人加入那些清一色由男性组成，且未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增加女性董事的董事会。此外，我们与各国公司就多样性和其他重大的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等主题进行直接对话，并发表观点和洞察，向董事会介绍提高企业内各级管理层的性别多样性的有效途径。

自2017年3月以来，我们呼吁超过1200家无女性董事的公司行动起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300多家公司已经在董事会中安排了一名女性董事，还有28家公司承诺会这样做。

但是，我们清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2018年9月，我们宣布了董事会性别多样性投票指南的升级版。自2020年起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市场，以及自2021年起在加拿大、日本以及欧洲大陆，如果企业的董事会没有一位女性成员，而且在连续三年间未能与我们进行成功的对话，我们将投票反对提名委员会提名的全部董事。

在采取更严厉的投票行动之前，我们为什么要给企业三年时间让它们实施那些我们认为会给投资者立刻产生积极影响的变革呢？我们的目标是确保董事会有效、独立的领导力，而这不仅需要拥有必要的技能，而且需要有多样化的观点。我们意识到，这个目标不可能一夜间成为现实，增加合格的候选人应该是进行周全考虑的过程，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的时间。

虽然不能认为那些仅有一名女性董事的公司性别多样性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相信在董事会中增加了女性的视角，这本身就是重要的一步。“无畏女孩”活动就是董事会在性别多样性方面的观念转变，让谈话从“我们为什么需要性别多样性”转向“我们为什么不能实现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我们相信，即便仅增加一名女董事，



道富的“无畏女孩”雕像树立在纽约市金融区的核心地带。

照片：GETTY/ANDOLU

也有助于改变这种观念。

对于任何行业、市场或规模的企业来说，性别多样性都是必要的。我们发现，当今的很多大企业正在齐心协力地将女性吸纳到自己的董事会之中，但在规模较小的企业内，女性董事不足的问题仍然很突出。

大多数存在性别多样性问题的董事会指出，女性董事候选人的人数有限，这是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然而，我们认为最大的障碍是当前提名董事的做法以及一直低估女性在职场中贡献的行为偏见。例如，有些董事会要求所有提名董事要有担任 CEO 的经历。

值得庆幸的是，障碍和偏见是可以克服的。通常那些董事会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公司的最佳实践是：确保董事会提名者的候选人才库的多样性。而且，我们在呼吁企业监督并披露自己的董事会以及各管理层级的性别多样性。我们相信，随着透明度的增强，这将有利于为合格的女性董事候选人提供更强大的通道。

几年前，我们与客户讨论过如何促进有关性别平等，以及如何从那些在领导层的性别多样性方面表现最出色的企业那里获得超额收益。受这次谈话的启发，道富推出了一个指数，从而让投资者可以实现影响与收入的双重目的。

道富全球顾问 (SSGA) 性别多样性指数于 2016 年 3 月正式推出，旨在推动企业的性别多样性，发掘那些在领导层的性别多样性方面表现更好的企业提升收益的潜力。这个指数甚至可以与慈善要素结合起来，以便将咨询机构的部分收入拿出来，用于支持那些关注面向年轻女性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项目的慈善机构。

几十年来，资产所有者使用负面筛选法，力争产生一些改变。根据这种方法，他们不会投资那些业务实践不符合投资者的个人价值观的企业，或者那些社会及公司治理评级较差的企业。很多投资者正在逐渐放弃这种排他性的方法，转而积极地将社会及公司治理为导向的方法作为一种工具，以期提升资产组合的风险调整后收益。

社会及公司治理整合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就是，对于企业的实践及其对财务表现的影响缺乏可靠、统一的数据。我们相信，在向投资者提供信息，以便他们将性别因素纳入对公司的分析方面，我们呼吁企业更好地披露各级管理层中性别多样性的这些管理倡议应该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很高兴看到整个投资生态系统（资产所有者、资产经理和企业）对于具有性别多样性的领导层的好处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截至 2018 年 3 月，即树立“无畏女孩”雕像一周年之际，控制着超过 13 万亿美元资产的资产经理和所有者已经加入我们的行列，将性别多样性作为管理工作的头等大事。

但是，这只是个起点。在道富，我们相信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企业都应不断探索全新的方式，发挥自身的专长，使投资者拥有更大的权利，促进全世界范围内各级领导层的性别多样性。FD

拉吉·库马尔 (Rakhi Kumar) 是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 ESG 投资和资产管理部高级执行董事、主管。

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为拉吉·库马尔的个人观点，并不构成投资建议，因此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



无偿照护工作的 隐性成本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应齐心协力，
共同推动性别平等

莎拉·甘米奇、纳兹哈·萨尔塔纳、玛侬·木兰

无报酬照护工作的责任过多地落在妇女和女孩的身上，从而使她们在教育、休闲、参与政治活动、带薪工作以及其他经济活动方面丧失了不少时间。她们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照顾家庭成员和家庭琐事上。在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在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有限或缺乏的国家，照护工作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Samman, Presler-Marshall, and Jones, 2016)。在农村地区和老龄化社会中，照护工作的负担尤其显得沉重。这种负担使得女性无法充分参与市场活动，只能集中在低收入、非正式或在家办公的工作领域，以兼顾无报酬照护与带薪工作。

在低收入和非正式工作领域，女性的占比过高会导致两性工资差距，进而造成女性的劳动价值被低估，“穷忙族”的人数不断增加。因此，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解决无报酬照护问题是关系到女性经济赋权的根本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妇女研究中心一直与欧洲复兴发展银行 (EBRD) 协作，研究在照护服务领域进行投资以及降低照护负担可通过何

种方式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这个项目的目标是，研究私人部门是否且如何发现并满足照护需求及责任，并将其作为制约它们雇佣、留用和提拔女性的能力的关键因素。这项工作的部分内容包括进行预测，如果公共和私人部门能更有效地满足照护方面的需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 EBRD 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中，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女性，两性的平均差距达 21%。在南地中海和东地中海国家，两性间的平均差距更大，达到 49%。

最近针对不同国家的多项研究分析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如何随育儿成本而发生变化。依托这些研究，我们可估算出向这种服务进行投资的成效 (Gong, Breunig, and King, 2010 ; Kalb, 2009; Lokshin, 2000)。利用这些研究，我们假设，如果育儿费用降低 50%，那么母亲的劳动供应量会增加大约 6%—10%。

我们建立了一种跨境回归模式，用于研究有关 EBRD 国家照护成本的两性劳动参与率差距。

我们的估算结果表明，一般来说，将政府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比（占 GDP 的百分比）提高 1 个百分点，会使两性劳动参与率的差距降低大约 10 个百分点。

通过运用这种关系，我们预测，每个 EBRD 国家将学前教育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提高 1.5%（这将是 EBRD 地区最大规模的投资，见图），将使两性的劳动参与率的平均差距从 21% 降至 6.5%。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幅最大的国家包括埃及、约旦、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在这些国家，平均差距从 49% 降到 13.5%。

私人部门的作用

我们究竟该如何通过投资保育服务来消除女性在劳动参与率方面的差距，谁来负责由此产

生的费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到影响的多个因素。我们与 EBRD 合作的项目重点关注埃及、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分析了私人部门是否认识到未能满足照护需求将会影响其招聘、留用和提拔女性的能力。我们对两性在投入带薪工作和无报酬工作的时间方面普遍存在的差距进行了分析，同时更深入地探究了社会标准和习俗，这是因为它们与照护问题有关——照护的任务由谁负责，应该谁来负责以及男性的角色。

我们还分析了这四个国家现有照护服务所依据的立法、政策和法规问题。我们所考察的照护服务相关政策涵盖面广，包括直接提供照护服务、与照护服务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那些有望增加儿童和家属照护服务并提高人们支付能力的补助、税收抵免和保育积分等途径。我们也分析了劳动政策及法规，如休假政策，以及其他有利于家庭的工作安排、教育和医疗行业的政策，还有影响提供照护服务的财政空间的宏观经济政策。鉴于这项研究的重心是私人部门，我们的分析工作具体关注了现有的法规是否以及如何对私人部门的照护活动进行监管，激励或削弱私人部门在提供照护服务时的参与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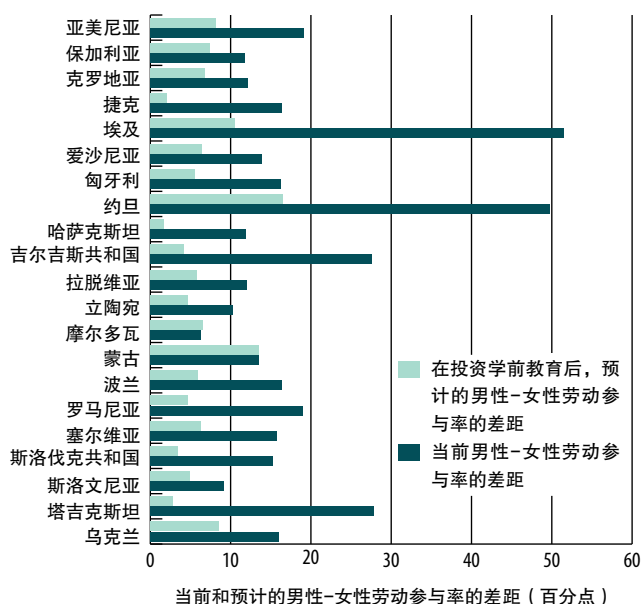
我们在对经理、工人和人力资源员工进行采访之后发现，即便是小公司也会出现因员工流失而造成的成本损失，而这些成本与这些公司未能提供照护服务有关。这类照护服务可以使女性在生育孩子后仍留在劳动力市场。

案例分析：土耳其

我们发现，在土耳其的一家拥有大约 800 名员工的中型涉农产业公司内，超过 70% 的员工是女性。员工流失给雇主带来不小的损失。这家企业雇佣的女性大部分是季节性工人，在低技能和体力劳动岗位上的占比过大。该公司依法为女员工提供产假，包括 16 周的带薪产假，另外还有 6 个月的无薪产假。在孩子年满一岁之前，母乳喂

减轻负担

学前教育方面的投资可缩小两性劳动参与率的差距。



资料来源：作者的估算。

养的母亲每天可抽出一个半小时为孩子喂奶。父亲会得到五天的带薪陪护假。但是，这家公司不提供托儿服务或补贴。

土耳其的雇员通常依靠其家庭成员（包括家里年龄稍大的儿童）来照顾孩子。针对五岁及以上年龄的儿童，政府提供保育和教育服务。然而，由于上学时间通常比工作时间要短一些，因此家庭成员还必须负责孩子的接送。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机制，那么女性可能要辞职来照顾孩子。

2017年，公司女员工的离职率超过了26%。人力资源部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通过采访员工和管理层获得的数据表明，每年都有91名女性为了照顾家庭而辞职。招聘和培训的直接成本，以及由于员工在逐渐掌握了所需的所有技能后离开所导致的生产率下降造成每年接近100万美元的损失，占公司年收入的14%。照顾一名六个月至三岁大的孩子的年平均成本为1100美元。这意味着，照顾孩子的成本低于员工流失和生产率下降的成本。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合作过的一家小型纺织公司每年要在员工的育儿费上花费25.8万美元，但随着女员工流动率的下降，每年可节省超过80万美元。

继续前进

目前，EBRD开展业务的很多国家都未在提供照护服务上投入足够的公共资金。私人部门要么向员工提供照护服务，要么为获得这些服务给予补助，借此来弥补其中的一些差距。这样可以补充并增强当前的公共部门项目。

提供保育服务包括各种解决方案，从提供现场照顾到补贴。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对这笔费用的分担比例是一道选择题。但是，只要照护需求责任由每个家庭来承担，那么将对企业产生不小的损失。解决照护服务不足的问题对企业而言利弊攸关。

从更大范围来看，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重点

说明了一个问题：缺少有关照护和有利于家庭的职场政策对公司、社区和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企业层面，显然很多公司需要得到指导，以了解如何跟踪未能满足照护需要所产生的全部成本，以及如何最有效地适应更多旨在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政策。我们合作过的很多企业尤其很难计算出员工流失成本，或者证明长期任职和留任的好处。在被问及有关个人和集体生产率的跟踪措施时，它们甚至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在社区层面，应针对普及照护服务的成本和益处以及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面开展更多的研究。在宏观经济层面，我们应该从就业和创造的财政空间角度来分析对照护服务进行投资的益处。

只有通过突出经济成本和提供照护服务的益处，我们才能改变有关照护服务投资的对话，以及有关在市场、国家和家庭之间重新分配角色和职责的对话，以达到支持全民高质量照护服务的目标。我们需要证明，未能解决照护服务不足这一问题也会对私人部门产生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藉此，我们可以确保制定出包含纳税和补贴在内的更全面的解决方案，以弥补公共部门在提供照护服务方面的不足。FD

莎拉·甘米奇（Sarah Gammage）是国际妇女研究中心性别、经济赋权和民生部门主管，纳兹哈·萨尔塔纳（Naziha Sultana）是该部门女权主义经济学家，玛侬·木兰（Manon Mouron）是欧洲复兴发展银行性别问题助理顾问。

参考文献：

- Gong, Xiaodong, Robert Breunig, and Anthony King. 2010. "How Responsive Is Female Labour Supply to Child Care Costs? New Australian Estimates." IZA Discussion Paper 5119,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 Kalb, Guyonne. 2009. "Children, Labour Supply and Child Care: Challenge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42 (3): 276–99.
- Lokshin, Michael M. 2000. "Effects of Child Care Prices on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Russia." Policy Research Report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1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Samman, Emma, Elizabeth Presler-Marshall, and Nicola Jones. 2016. "Women's Work: Mothers, Children and the Global Childcare Crisis."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银行业要为女性的未来提供服务

数字金融服务正在取代中间人，实现机会平等

莎拉·亨德里克斯

照片由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提供。



造成贫穷的原因并非单一的事实或状况，而是众多事实和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乏金融资产、无法获得财产以及在自己的社区里没有发言权。

与以往一样，如今贫穷对女性的影响依然最大。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收入要比男性低 63%，然而她们花在家务活这种无报酬劳动中的时间是男性的 3 倍。数十年的研究也表明，贫穷对女性的影响不同于男性，而且贫穷使女性丧失了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机会。

相反，我们清楚，当女性有权赚钱、花钱、储蓄和支配金钱时，她们不仅为自己获取利益，而且为自己所在的社区做出贡献。据麦肯锡研究所的估算，如果能让女性充分融入经济活动之中，那么全球 GDP 到 2025 年将增加 12 万亿美元。

换句话说，实现性别平等有利于各国的发展。

我们在帮助女性充分释放她们在掌控自身经济前景方面的潜能时，可采用投资于普惠金融的方法。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我们强调将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考虑在内。在这些国家，2/5 的女性根本没有金融账户。鉴于约 10 亿女性无法获得正式的金融服务，我们需要一些能大规模应用的解决方案。

数字金融服务——包括移动支付、借记卡和信用卡、电子商务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比其实体分公司更为高效的发展，而且费用远远低于现金服务及交易所产生的费用（低 90%）。

在利比里亚，教师在领取现金收入时，耗在路上的时间很长，单程最多可达 10 个小时，因此他们经常会错过工作，而且路费高达其工资收入的 15%。在实现工资数字化之后，教师每两周平均可节省 13.5 小时，领取工资的成本降低了 90%。如此一来，他们将会有半天多的时间在教室里辅导学生，或是陪伴在家人身边。

如果一位女士拥有银行个人账户用来存放自己的收入，那么她在生活中便获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在孟加拉国，女性是服装厂员工队伍的绝对主力。但根据该国的社会传统，女性通常会把自已的现金工资交给丈夫或父母。因此，在决定自己赚的钱怎样存储或是怎样支出时，她们几乎没有发言权。然而，“优于现金联盟”（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开展的研究表明，在采用数字化方式支付工资的服装厂里，那些声称由于其家庭成员控制了自己的工资而无法攒钱的员工数量减少了 69%。

针对女性的普惠金融是推动性别平等的众多

强大杠杆之一。但是，如果无法真正理解女性的生活现状，我们不可能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使全球各国认识到性别数据的缺失。这是因为，在有关性别平等的 14 个指标中，仅有 3 个指标拥有充分的数据，帮助我们跟踪进展情况。显然，我们需要更多的和更好的数据。2016 年，我们的基金会宣布投资 8 亿美元，帮助填补有些关键性别数据的空白。借助于更有效的数据，决策者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哪些办法行得通，哪些办法行不通，然后采取一种经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

IMF 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举措，以解决性别数据缺失的问题。IMF 每年发布一次的“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从供给侧角度分析了普惠金融，以便为分析工作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去年的调查首次按性别分解了数据，让我们能看到哪些国家正在缩小交易（如借款和存款）中的性别差异。这些信息对我们了解那些能支撑这种增长的战略和政策有重要意义。

我们也在研究科技如何帮助女性克服或绕开在实现女性普惠金融的道路上会遇到的某些社会和文化障碍。例如，让女性通过自动流程来申请账户，这意味着她们不会被某些代理商拒之门外，这些代理商认为女性就不该有自己的钱。世界银行临时行长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将数字金融应用程序比作当今很多大型交响乐团进行的海选。她说，数字金融服务“对商界女性的作用就如同大幕对于音乐界的女性一样”。

在发展中国家，大约 8000 万名无银行账户的女性接收政府的现金转移支付。我们发现，大规模开展面向女性的普惠金融和女性赋权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人们获得和使用现金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当我们与政府在社会支付计划方面开展合作时，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开展这项工作：实现供给侧支

付的数字化，专门面向女性的数字化支付，以及制定计划，以确保数字化支付能满足女性的特殊需求。只有在做好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后，女性才能真正地实现普惠金融并从中受益。

如果一位女士拥有个人账户用来存放自己的收入，那么她在生活中便获得了更大的控制权。

我们还与政府在身份制度和要求方面开展合作。在几乎所有国家里，人们在开立账户时都要提供个人身份的法律证明。但是，在低收入国家，45% 以上的女性没有正式的身份证件，而存在这种问题的男性仅占 30%。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已经成功地启动了全国数字身份项目——通过使用生物特征数据，可彻底避免识字能力这个障碍。如今，女性可使用自己的全国身份证号来开立数字金融账户，还可与政府服务直接联网。

将数字身份和数字账户结合起来，对政府和公民来说是一件互利互惠的事情。在印度，通过发放数字身份证，数百万人首次在银行开立了账户。在巴基斯坦，政府将身份系统与社会支付项目联网后，申请办理身份证的女性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在盖茨基金会，我们认为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价值。可在今天，我们深知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在更大的不平等的背景下，有权获得数字金融服务可能只是向前迈出一小步。但对于那些成天要靠步行去领取工资的女性，或是财务决策权掌握在他人手里的女性而言，数字金融服务将改变这个世界。当女性，尤其是最贫穷的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权力和机会时，将带来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助推我们不断前进。FD

莎拉·亨德里克斯（Sarah Hendriks）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性别平等事务主管。

日本的 性别差距



职业机会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工作时间长使
两性间的工资差异无法消除

三口一男

日本在性别平等方面并未取得进步，至少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这样。尽管日本政府近年来通过了多项促进女性经济活动的立法，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2018 年性别差距指数，日本在 149 个国家中仅排在第 110 位。该指数对各国在四大方面为了实现性别平等而取得的进展进行衡量。虽然日本的这个排名要比 2017 年高一些（在 146 个国家中排名第 114 位），但仍与前几年的情况相似，甚至更低一些（2016 年排名第 111 位，2015 年排名第 101 位）。

日本的排名之所以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男女工资的差距较大。2018 年，两性的工资差距达到 24.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韩国。

那么，日本的两性收入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妇女属于“非正式”员工。在日本，“正式”员工既无任期限制，也无具体的工作职责，完全没有被解雇和下岗之忧。相比之下，非正式员工（包括很多全职员工）签订的是固定期限合同，承担着具体的工作职责。2014 年，20—65 岁职业女性中有超过 53% 的人属于非正式员工，而男性非正式员工的比例仅为 14.1%。

像其他国家一样，日本的非正式员工的工资都很低，无论其年龄和性别。另一方面，对于正式员工而言，在他们 50 岁之前，工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这是因为在绝大部分日本公司，正式员工能凭借其任职年限而得到加薪。由于雇主认为新毕业的学生才是正式工作岗位更理想的人选，因此两性在非正式员工队伍中所占比例的差距永远无法消除。因为雇主往往会优先招聘更年轻的求职者，所以那些为了照顾孩子而辞职，之后想要重回职场的女性要想找到正式工作的机会就少之又少了。

然而，通过将就业类别（四大类别：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全职工作和兼职工作）和性别结合起来，据此对两性工资差距的分析表明，两性在就业类型上的差距——具体来说，从事非正

式工作岗位的女性占比高于男性——在两性工资差距的构成因素中仅占 36%（Yamaguchi, 2011）。实际上，主要构成因素是全职正式工作中的两性工资差距，这种差距占两性工资差距构成因素的一半以上。因此，相对于解决非正式工作中女性占比过大的问题，消除正式员工中的两性工资差距是一件更紧迫的事情。

女性往往缺少进入职场的机会，但那些被认为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除外。

由男性主导的管理层

在日本，造成正式工作中两性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层中女性的匮乏。日本厚生劳动省的《2016 年平等就业机会基本调查》表明，女性担任部门总监或同等职位的比例为 6.4%，担任分部主管或同等职位的比例为 8.9%，担任工作组主管或同等职位的比例为 14.7%。

这次调查还采访了那些很少有女经理的公司雇主，询问他们为什么鲜有女性担任高级职位。我们预先设定了许多可能原因，其中有两项被他们认为是主要原因：“在招聘时，女性不具备必要的知识、经验或判断能力”，以及“由于女性的就业时间较短，在达到管理职位之前就退休了”。雇主持有这种观点是受到了误导，因为我自己的研究（Yamaguchi, 2016）揭示了完全不同的情况。

我对拥有至少 100 名员工的公司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层管理（分部主管）及以上岗位的正式员工中的两性工资差距仅有 21% 是由两性在教育和工作经验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而造成这一工资差异的其他原因是，对于教育和工作经验相同的员工来说，两性在晋升到管理岗位的比例方面存

日本传统的劳动分工仍根深蒂固。在婚后，育儿和家务活的重任主要由女性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与日本的家庭角色是格格不入的。

在差异。女性的工作时间有限并不是主要原因。我的分析进一步表明，男性身份本身便可使其担任经理的几率提高 10 倍以上，而大学生这个身份只能使其担任经理的几率提高 1.65 倍（这项研究未考虑决定担任经理的其他因素）。

对于社会中的机遇和奖励，如果决定性因素是个人成就，那么我们将这种社会称为“现代社会”，可如果决定性因素是地位，那么我们将这种社会称为“近代社会”。尽管“后现代主义”是日本探讨过的话题，但日本当代社会仍保留着一些无法被视为“现代”的特点。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管理者的决定因素是其出生时的性别，而不是个人成就，如个人取得的大学学位。

就晋升到管理岗位的占比来说，性别隔离的职业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日本的性别不平等。在日本存在着一种管理职业路径（sogo shoku）和一种无希望的职员路径（ippan shoku）。这种路径体系与性别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很多女性有更大的机会获得职业发展，但她们并没有沿着管理职业路径前进，因为这要求她们要经常性地加班。

的确，对于女性来说，要想当上经理，主要就是去面对长时间的工作。这说明，如果女性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加班，那么她们就无法成为经理。但是，日本传统的劳动分工仍根深蒂固。在婚后，育儿和家务活的重任主要由女性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与日本的家庭角色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日本公司坚持要求员工接受长时间的工作，这才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而对于达到管理岗位来说更是如此。

传统的角色根深蒂固

造成两性工资差距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职业领域中存在严重的性别隔离。在 OECD 国家，女性在社会性职业（如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中的占比通常过高。日本还存在另外两个特点。首先，即使在社会性职业方面，女性在高职位职业中的占比偏低。例如，在 OECD 国家中，日本女医生和女大学教师的占比最低。其次，女性在非社会性职业（如科研、工程、法律和会计）中的占比非常低。

我最近开展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专业人才之间的两性工资差距，并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本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上。根据 2005 年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调查以及 2010 年美国的人口普查结果，我分析了上述两类职业的性别比例：一是社会性职业，不含高职位职业（如医生和大学教师），我将之称作“第二类职业”；二是其他职业，包括高职位社会性职业以及所有其他非社会性职业，我将之称作“第一类职业”。研究表明，在日本，女性在后一类职业中的占比极低；在美国，12.7% 的女性员工处于第一类职业，而日本女员工的这一占比竟然不足 2%（见图）。在日本，女性的工作显然集中在第二类职业。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这种对职业的划分导致两性工资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一，虽然第一类职业中的两性工资差距很小，但是女性在这些职业中的占比极低。第二，在第二类职业中，两性工资差距很大。虽说第二类职业中男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于从事文员、销售或体力劳动的男性，但第

二类职业中女性的平均工资不仅低于同一类职业中的男性的平均工资，也低于从事文员、销售或体力劳动的男性的平均工资。

我的研究还表明，在管理岗位和第一类职业中女性的占比较小，但这不能用教育背景（包括大学专业）方面的两性差别来进行解释（Yamaguchi，即将发布）。在 OECD 成员国中，仅有日本和土耳其的女大学生的毕业率仍低于男大学生。因此，我们预计，通过实现性别平等，可以缩小两性在实现高职位职业上的不平等。但是，我的分析表明，随着女大学生的毕业率不断攀升，如果当前按性别分门别类的教育和职业匹配依然持续存在，那么这种匹配关系将最主要体现在：在女性占比已经过高的第二类职业中，女性的人数还会继续增加。另一方面，在女性占比较低的管理类职业和第一类职业中，女性人数的增幅最低。因此，一般来说，在教育程度上实现性别平等不会使两性工资差距大幅缩小。

这个规律的唯一例外情况是，在攻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比例方面实现了平等。这样将会增加女科学家和女工程师的占比，从而降低两性在第一类职业工作中的差异，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两性的工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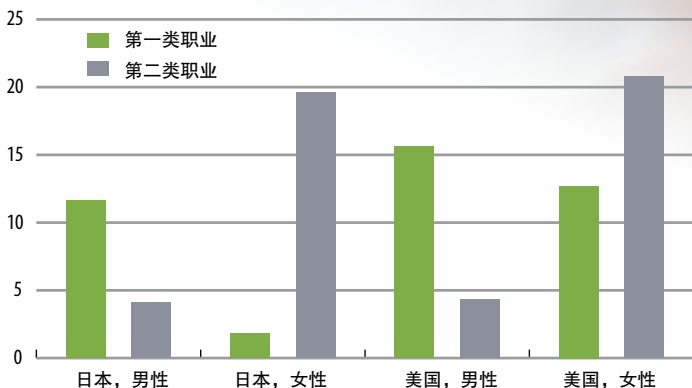
在日本，教育背景无法解释职场中的性别隔离，表明性别隔离体现了日本的雇佣实践。由于这些实践根源于性别角色的定型，女性往往缺少进入职场机会，但那些被认为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除外。日本女性可选择的主要职业为女性传统家庭角色的延伸，如孩子的教育、保育及医疗方面的其他支持性角色。日本的雇主应该承认，职场并不是家庭性别划分的延伸，而是个人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并为社会做贡献的场所。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至今仍未看到日本雇主对上述观点的认同。

尽管政府希望实现同工同酬，尤其是从事相同工作的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同工同酬，但

按性别划分的职业：日本和美国

在美国，12.7%的女员工在社会性职业之外的更繁重的岗位上工作。而在日本，从事此类工作的女性不足2%。

（百分比）



资料来源：山口一男。

注：第一类职业是指社会性职业之外的其他职业，如工程、法律和会计。第二类职业是指社会性职业，如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但不含较高端的社会性职业，如医生或大学教授。

我认为，提供相同的职业机会，尤其是在管理岗位和高职位的职业岗位上提供相同的机会对于缩小日本的两性工资差距更为重要。而且，雇佣实践和长时间的工作要求使女性缺少机会的问题仍会持续存在，因此政府应努力创造条件，更好地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改变那种依赖长时间工作的职场文化，推动建立灵活的职场环境。这也有利于转变照顾孩子和干家务活的责任完全由女性来承担的传统观念即。FD

三口一男（Kazuo Tamaguchi）是芝加哥大学以 Ralph Lewis 命名的社会学荣誉教授。

参考文献：

Yamaguchi, Kazuo. 2011. "Decomposition of Inequality among Groups through Counterfactual Modeling: An Analysis of the Gender Wage Gap in Japa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43:223-55.

———. 2016. "Determinants of the Gender Gap in the Proportion of Managers among White-Collar Regular Workers in Japan." *Japan Labor Review* 51:7-31.

———. In press. *Gender Inequalities in Japanese Workplace and Employment—Theor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Springer.

A portrait of Branko Milanovic, a middle-aged man with a grey beard and glasses, wearing a dark grey sweater over a light blue shirt. He is sitting at a wooden table with his hands clasped in front of him. The background is a blurred green wall with a dark vertical stripe.

阶层分析家

克里斯·威利兹采访研究不平等问题知名学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照片: IMF PHOTO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c) 的童年是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 1968 年的那场抗议活动。当时，学生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校园，高举写着“打倒红色资产阶级”的标语。

目前，米兰诺维奇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主讲经济学。据他回忆，他当时在想自己的家庭是否属于那个臭名昭著的集团。他的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与当时南斯拉夫的很多孩子不同，米兰诺维奇拥有属于自己的卧室——在一个名义上无阶级的社会中，这象征着一种特权。那年夏天他和朋友们在校园周围闲逛时看到有学生在炫耀红色的卡尔·马克思徽章。对于那种兴奋感，他至今仍记忆犹新。

米兰诺维奇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想我后来对于那些抗议活动的社会及政治影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即便如此，在他探求知识的过程中，“1968 年在很多方面堪称一个分水岭”。如今，他已成为不平等问题方面的知名学者。在不平等成为经济学领域热点问题的几十年前，他就选择了这个主题作为自己当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今天，米兰诺维奇最出名的研究是他在 1998 年至 2008 年期间对全球收入不平等进行的突破性研究。这段时期大致始于柏林墙的倒塌（这意味着欧洲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止于全球金融危机。

2013 年，米兰诺维奇与克里斯多夫·拉克纳 (Christoph Lakner) 合作完成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所谓的“大象曲线”。这种曲线因其外形而得名（见图）。该文章说明，20 年来（也就是米兰诺维奇所称的“高度全球化”时期）急剧增加的财富未能在世界各地得到平均分配。发展中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主要在亚洲）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长。全球收入最高的 1% 的人（“全球富豪”）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同时，发达国家中下阶层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大象曲线的优势在于它的简洁。它很好地总结了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强烈不满的原因。这种不满情绪使得政界中的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的事业如日中天，也使贸易壁垒和限制移民的呼声日渐高涨。

畅销书《21 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说：“布兰科对全球不平等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尤其是体现在他有关大象曲线

的研究成果上。大象曲线为未来的研究定了调。”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在 2018 年的一项研究中证实了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发现，1980—2016 年与全球收入最低的 50% 人群相比，收入最高的 1% 人群实现的收入增长幅度是前者的两倍。

皮凯蒂说，米兰诺维奇的研究成果“似乎要比最初的设想更让人吃惊。这头大象看起来更像是头猛犸象。”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不平等问题研究不屑一顾。很多经济学家都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神秘的“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理论之中。这种人的唯一特性就是希望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人或群体之间的差异无足轻重。多样性无足轻重。只有平均水平才是关键。

在这个充斥着相同的理性参与者的世界中，供需力量施展其魔法，决定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及数量，同时能最大限度地造福整个社会。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它只是市场力量的副产品。

“市场解决了一切问题。”米兰诺维奇说，“因此，这个题目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

随后，2008 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他说，在这场危机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收入最高的 1% 或 5% 人群在收入增长方面远远超过了中产阶级”。

数据爆炸也成为推动不平等问题研究的积极因素。通过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挖掘，从而更容易地将毫无特点的消费者和工人划分成具有共同特点的群体。他说，大数据“使得有关异质性的研究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来讲，不平等就是一种异质性。”

数据一直是米兰诺维奇热衷的研究领域。除此之外，在布鲁塞尔读中学期间，他对社会阶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身为经济学家的父亲曾在布鲁塞尔担任南斯拉夫驻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使。

“布鲁塞尔的中学有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我想，这跟法国的中学一样。”他这样说道。

他的同学分成两派：左翼孩子和“资产阶级”孩子。前者深受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作为代表表面上看似工人阶级政府的享有外交官特权的人之子，年轻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并不属于任何一派。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情况。”

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米兰诺维奇起初对哲学情有独钟，可后来他认定经济学更实用一些。此外，经济学可以让他将自己对统计学和社会阶层的兴趣结合起来。

在攻读研究生时，他获得了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在那里，除了明显的收入不平等和种族歧视之外，让他难忘的是美国社会的富足——大量价格低廉的食品、免费续杯的咖啡以及大轿车。

两年后，他回到贝尔格莱德，潜心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他采用的是一位在南斯拉夫联邦统计局工作的朋友提供的难得一见的家庭调查数据。

除了他决定不加入共产党之外，他的博士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盛行的南斯拉夫令人震惊。这篇论文也为他开启了在世界银行研究局长达 20 年的职业生涯。

“布兰科的确是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知名专家之一，即便在当时也是如此。”艾伦·盖尔布 (Alan Gelb) 说道。他聘请米兰诺维奇加入了一个小分队，

主要研究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东欧各国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米兰诺维奇重点研究贫穷和收入分配问题。

世界银行收集的大量数据堪称是极其珍贵的资源。凭借这些数据，米兰诺维奇对不平等问题进行了跨国比较。这在学术界尚属新事物。1995 年的一天，米兰诺维奇与他的部门主管、盖尔布的继任者谈到这个问题。

“我突然有了这个想法：‘瞧，现在我们手头上有世界各地的数据，但我们只研究单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过。’”四年后，他根据家庭研究的结果，发布了第一份有关全球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

在随后的几年里，米兰诺维奇发布了大量涉及面很广的研究报告。除了对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经济体进行研究外，他继续研究不平等问题及其与全球化的联系。他的文章和著作展现了他各种广泛的研究兴趣，包括历史、文学和体育。

在一篇文章中，他估算了公元 1000 年拜占庭时期的平均收入和不平等情况。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足球领域（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体育项目）内劳动力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

他发现，由于欧洲十几个顶级球队资金实力雄厚，能招募到世界最杰出的球员，因此足球俱乐部变得极为不平等。另一方面，足球运动员的自由流动降低了各国足球队之间的不平等。其原因是，那些小国家的球员可以在顶级俱乐部的球队中提高自己的球技，然后他们回国，为自己的国家队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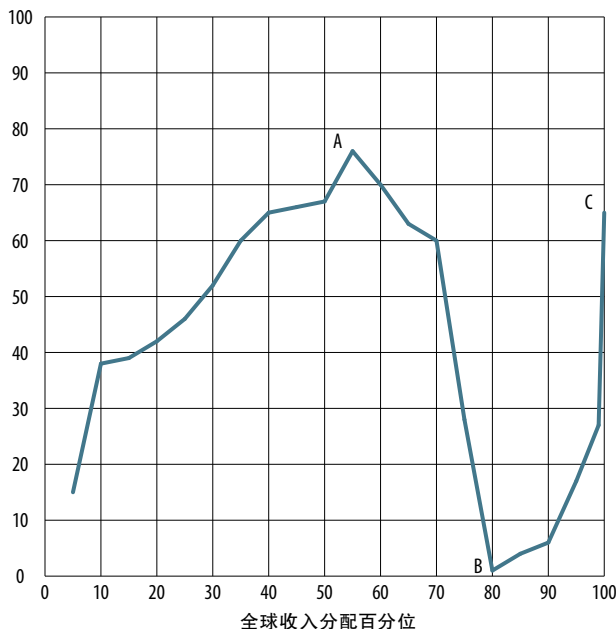
他的妻子米歇尔·德·纳维尔 (Michele de Nevers) 是全球发展中心气候融资方面的专家。他经常与妻子讨论文学问题。他从中获得了灵感，撰写了一篇颇有新意的文章，对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部名著既在探讨金钱，也在探讨爱情。他估算了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收入，分析了财富如何影响奥斯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班内特选择生活伴侣的决定。

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进行了相同的研究。这两篇论文收录在米兰诺维奇 2011 年的著作《富与贫：全球不平等简史》(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 中。

他的另一部著作《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

不平等的分配

1998—2008 年收入增幅最大的群体大约分布在全球收入分配第 50 个百分位 (A 点)，出现在最富有的 1% 人群中 (C 点)。收入增幅最小的群体大约分布在全球收入分配第 80 个百分位 (B 点)。他们大都是发达经济体的中下阶层。



资料来源：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注：PPP=购买力平价。

的新途径》(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堪称里程碑之作。这本书包含了 他多年来对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内部以及不同国家间 不平等问题学术研究成果。

皮凯蒂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平等的扩大 之势不可阻挡。但米兰诺维奇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 受到他所说的良性因素和恶性因素的影响,不平等会 呈波浪式或周期性变化。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发 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直到战争和恶性通 胀彻底摧毁了财富,进而缩小了这种差距。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像累进税制、更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以及教 育的大众化趋势这样一些良性因素缩小了贫富差距。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分水岭。在中国实施对外开 放之际,这个历史事件使得前苏联阵营国家融入全球 经济之中。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 贫富差距。在这些国家,随着富有阶层的壮大,中产 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

未来会怎样呢?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 发展中国家来说,未来是美好的。这些国家将不断追 赶那些富有的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前景似乎更 严峻一些。

在发达国家,全球化进程和科技创新这两股力量 将持续挤压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由于牢不可破的精 英集团更容易接受费用较高的高等教育,而且可以通过 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制定一些“有利于富人”的政 策,如有利的税制,这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将出现向 下的态势。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紧张和政治争夺将会 加剧。自本书问世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英国脱 欧和法国的抗议活动)证实了这个预测。米兰诺维奇担 心这种摩擦可能会导致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割裂”,从而 形成美国的富豪统治以及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

过去十年间,虽然有关不平等的争论一直很激烈, 但在政策方面“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他说,“我们 如同坐在一个自动驾驶的车上,它很可能将带领我们 走向更大的不平等。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

解决不平等的常规方法是收入的再分配,不过它 不会像过去那样行得通了。这是因为资本的流动性会 使富人将自己的收入藏在避税港。相反,政策应该将目 标放在“禀赋”(如财富和交易)的再分配上。具体措 施可以包括提高遗产税、鼓励企业将股份分配给员工

的政策,以及政府增加对教育的资金投入。

“我们不可能在一夜间实现这一切。”他说,“但我 想,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希望走向这样一个资本主义 世界——在那里,财富会比今天得到更公平地分配。”

米兰诺维奇探讨了各国间的不平等这个令人不满 的问题。据他计算,与一个出生在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 相比,一个美国人仅凭出生在美国这一点便可拥有比前 者高出 92 倍的收入。这便是米兰诺维奇所说的“公民 权溢价”。随着那些出生在穷国的人寻找出路,这便造 成了移民压力。

米兰诺维奇认为,阻止移民和阻止商品或资金的 流动一样是徒劳的。然而,指望发达国家的公民开放 国家边界也是不切实际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让 更多的移民充分享有公民权,而不是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也许可以向他们征税,用税金来补偿那些失业的公民。

从一定意义上讲,他当前的研究工作让他将目光 再次投向了祖国南斯拉夫。他还研究了中国的社会阶 层结构,尤其是深入分析了处于收入分配前 5% 的人群。 这成为他的下一部著作《孤单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Alone)的一部分。这本书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一种 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将与那些历史悠久的自由资 本主义国家共同存在。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紧张 和政治争夺将会加剧。发生的一些 重大事件(如英国脱欧和法国的 抗议活动)证实了这个预测。

有关不平等的研究将走向何方呢?得益于新数据 的大量出现,米兰诺维奇发现了两个前沿领域:一个 是财富不均(如皮凯蒂);另一个是代际不平等,这是 诸如哈佛大学的哈吉·柴提(Raj Chetty)等经济学家 研究的课题。

他说,这两个领域“吸引着那些如今拥有强烈社 会意识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他们很聪明,希望研究 一些有难度的课题。”他补充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 非常乐观。”^[1]

克里斯·威利兹(CHRIS WELLISZ)是《金融与发展》 的工作人员。



实施稳健的政策

埃尔韦拉·纳比乌丽娜解释了大胆的政策行动如何帮助俄罗斯避免了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完成了银行业的改革

2013年，在出任俄罗斯央行行长之后的数月内，埃尔韦拉·纳比乌丽娜 (Elvira Nabiullina) 面临因油价大跌以及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诱发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截至2014年12月，俄罗斯的汇率和银行体系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俄罗斯经济正在陷入衰退。此时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俄罗斯央行决定推行浮动汇率政策，宣布立刻实施通胀目标制度，加快银行业改革步伐。这些大胆的政策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身为俄罗斯央行的首任女行长，纳比乌丽娜被《欧洲货币》杂志评选为“2015年年度央行行长”，被《银行家》杂志评为“2016年欧洲最佳央

行行长”。她的名字还出现在《福布斯》公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榜单上。

在此次接受IMF信息沟通部奥尔加·斯坦沃卡 (Olga Stankova) 的采访时，曾担任过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的纳比乌丽娜谈到了自己如何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做好俄罗斯央行行长的工作。

《金融与发展》：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当央行宣布通胀目标并通过其政策行动来控制通胀预期时，通胀目标制度是一件相当复杂和艰巨的事情。俄罗斯采取这种政策的依据是什么？

纳比乌丽娜：通过观察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发现通胀目标制度是一种有可能降低通胀，确保通胀保持在低水平的政策。当然，这项政策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有一定的挑战性，毕竟它们的金融市场不够稳健，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胀目标制度要求对通胀期望值进行有效的管理。在新兴市场国家，这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国家的民众经历过高通胀的时代，因此已经适应了高通胀，也不相信能在更长的时期内实现低通胀。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突然调整通胀目标制度。在2008—2009年危机爆发后，我们已经着手为这项制度做准备。首先，我们开发了银行再融资所需的工具。借助于这些工具，我们可以通过传导机制，利用利率政策来实施有效的通胀管理。其次，我们逐渐采用更灵活的利率，从相对严格管控的利率转向浮动利率。再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通胀目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预测和分析的质量，因此我们也培养了这种能力。我认为，这三个方面极其重要，可确保我们能实现自己曾经向公众许下的承诺。

《金融与发展》：在2014年底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实施了浮动利率。在那种局面下，还有其他好的选择吗？延长汇率的管控时间是一种办法吗？

纳比乌丽娜：没错，在危及金融稳定的风险

不断加剧的阶段，我们不得不推行浮动汇率。然而，我深信这并不是我们推迟做决定的理由。否则，我们也只能是在耗费了部分黄金和外汇储备之后，不得已还是得走浮动汇率这条道路。

依我看，浮动汇率已经有效地缓解了外部冲击，在短时间内推动了对国际贸易平衡的调整。2016年，在下一个周期内，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情况。你可能会记得，2016年初油价下跌。由于实施的是浮动汇率，我们的整个金融市场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

《金融与发展》：为了赢得更多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俄罗斯央行采取了哪些措施？沟通发挥了什么作用？

纳比乌丽娜：在政策过渡期，沟通极为重要，不仅可以向全社会说明当时的局面，还能证明新政策的优势。

与其他政策相比，通胀目标制需要与市场进行更高质量的沟通，这是因为它离不开对期望和预测的管理。

我们大大丰富了自己的信息通讯工具包。首先，我们会提前宣布年度董事会会议的日期。我们也开始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更多的分析资料、报告、访谈和调查，而且安排投资者与分析师的见面会。

最初，我们的着眼点是保证分析师和市场专业人士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实上，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确定市场参与者的通胀期望值。如今，关键是要与更多的企业受众和公众进行沟通，增强他们对我们的政策的信任，让民众在制定自己的人生计划和经营计划时更有信心。

《金融与发展》：你还推行了银行业的改革。在这次改革背后，你有哪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

纳比乌丽娜：经济的稳定增长离不开稳健的金融体系。薄弱的经济体系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我们的银行系统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银行系统缺乏充足的真实资金。你可能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银行系统经历了极其迅猛的发展，但缺乏资金。即便在后来，银行系统的流入资金仍比较有限。其次，由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

还有2014—2015年的危机，银行的资产质量严重恶化。这些资产一直滞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我们需要妥善处理这些资产。还有一个原因是，银行常常被肆无忌惮地利用，进行不道德的行为。由于风险管理不善，这些资产的所有者利用银行为自己的企业融资，甚至还存在洗钱活动。

显然，我们必须重建银行系统，毕竟它已无法支撑经济增长，而要在经济中生存下来，则需要持续注入大量的资金。而且，要想避免在未来注入新的资金，我们必须建立更健康的银行系统。

必须采取措施，否则爱尔兰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陷入一种更高融资成本和无法进入市场的恶性循环。

我们认识到，市场希望国有控股比例有所下降。我们当然希望在机会成熟时将我们临时持股的银行重新推向市场。其实，我们目前在努力做这项工作。

《金融与发展》：作为央行行长，你认为哪些领导素质才是你成功的关键？

纳比乌丽娜：首先，发现那些你可以信赖的专业人士，不要害怕自己的身边都是一些有能力的人。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样的话，人们才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接着，在这个基础上做出决定，不要偏离这个决定。

对于央行的工作人员来说，关键是要认识到他们是在为公共利益服务，在为实现长期目标而努力工作。我们要兑现自己对社会做出的承诺。不管是对于我还是我的员工来说，这都是一项重要原则。

任何政策，包括货币政策，都免不了要做出妥协。但是，关键是要明白妥协是有限的。**FD**

由于篇幅所限且为了表达得更清晰，本文对采访稿进行了编辑。



一切往事， 皆为序章

古罗马的教训表明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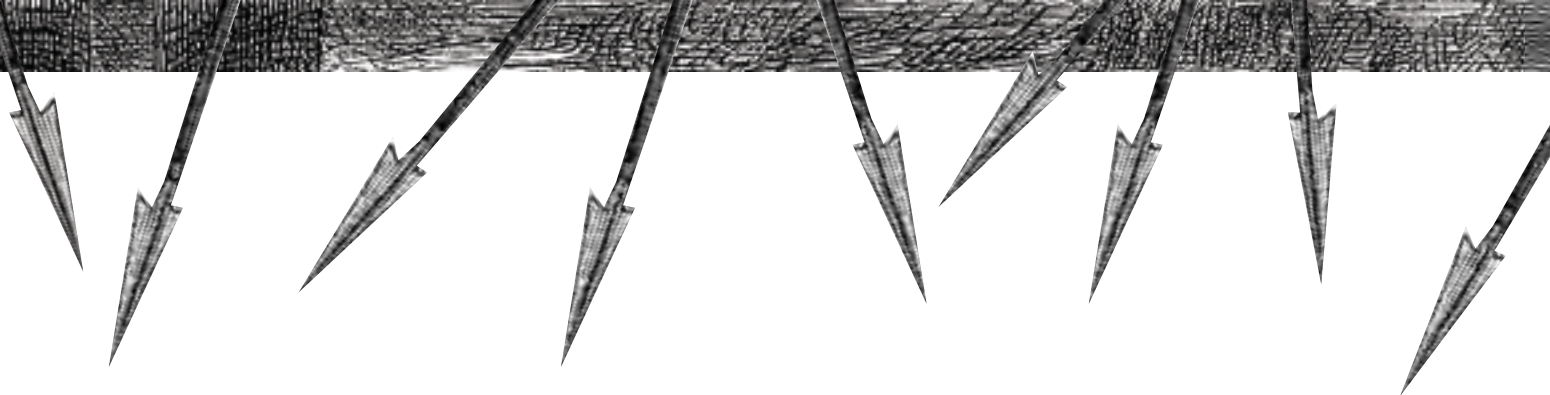
安东尼·阿内特、约翰·列普斯基

可持续发展包含这样一种观点，即物质进步必须始终与社会包容和尊重环境携手并进。与这两个支柱脱钩的经济增长将是自我破坏的行为。古罗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悲剧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避免悲剧发生的案例研究。

罗马共和国持续了 500 年，因为它的制度足够灵活，能够适应两大挑战——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内部冲突，以及与敌对国家的外部冲突和被征服人民的融合。尽管局势持续紧张，但罗马人仍因共同的价值观而团结一致，这种价值观是一种深根于公共服务的荣誉感以及对共同利益的承诺。

这一中心思想一直维持了几代人，直到它不再延续。起初，变化是微妙的。公元前 2 世纪初，罗马共和国的版图从高卢延伸到希腊，领地的扩张为其带来了大量财富，包括进贡、新省的税收以及金属矿的开采。超级富有的罗马新阶层创造了金融工具来打包债务、转售债务，并将利润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这听起来有点耳熟吧？在诸多方面，这是一种古老的全球化形式，包括贸易和金融。到公元前 1 世纪，繁荣将罗马的人口推向近 100 万人，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达到这一里程碑的城市。





在罗马共和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个世纪内，一连串的领导人们打破了以前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规范。

但一切都不顺利。新财富没有被广泛分享。大量奴隶的涌入颠覆了劳动力市场，使士兵和公民失业，并且越来越愤怒。与此同时，正如爱德华·沃茨(Edward Watts)在他的新书《凡人共和国》(Mortal Republic)所指出的那样，财富积累开始取代个人美德和为国服务，成为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而精英们并不是仅仅把新获得的财富用在别墅和奢侈品上。与他们的祖先不同，这些精英进行大规模的贿赂和腐败，以确保政治荣誉和职位，以及获得司法豁免。

也许没有人比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更能展现这个时代的情况。他的财富主要来自腐败的房地产投机，数量巨大，足以与整个罗马国库相匹敌。作为数百名政治家的资助者，他从自己的财富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没过多久，断层线破裂。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精英阶层通过分享权力和重新平衡政治来回应该民的不满。但在自身利益和腐败的影响下，共识瓦解。

同样的模式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世纪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与贵族的不妥协相互碰撞，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往往以暴力的方式结束。

这个周期始于格拉古(Gracchus)兄弟俩提比略(Tiberius)和盖约(Gaius)。提比略推动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但是，他的改革计划引发了保守派的反对，最终他被殴打致死。他的弟弟盖约继承其遗志，专注于粮食补贴形式的社会保

护，并通过司法改革打击腐败。最终他也被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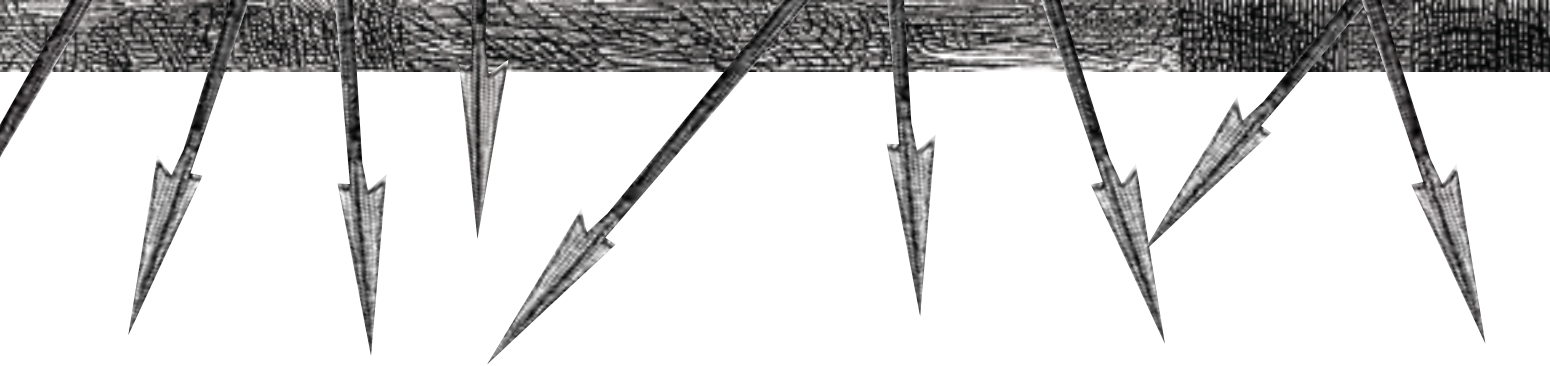
在一片混乱之后，盖乌斯·马里乌斯(Gaius Marius)成为穷人的捍卫者，掀起了一股反对参议院腐败的民众浪潮。但他最终与那些将暴力作为政治手段的人结盟，引发了贵族的强烈抵制并导致苏拉的独裁统治。苏拉做了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率领军队进入罗马市区。在他统治期内，实行大规模的禁令，没收财产，剥夺平民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像卡特琳(Cataline)和克洛迪斯(Clodius)这样肆无忌惮的贵族通过利用民众的挫败感，包括肆意依靠暴力和恐吓的手段来寻求发展自己的事业。

所有这些都为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铺平了道路。凯撒使用强硬手段推行民粹主义改革。但在内战胜利之后，凯撒也被冠以独裁者的称号，并变得越来越专制。他的死引发了另一轮民间杀戮，实际上摧毁了罗马共和国。

在罗马共和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个世纪内，一连串的领导人们打破了以前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规则。政治暴力成为常态。国家机构被包装成武器用以迫害反对者。暴徒越来越愤怒。反过来，强者提出要恢复秩序。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不平等和腐败所造成的。

在罗马共和国崩溃之后，罗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复兴，尽管和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镇压民主制度来维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伟大编年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认为，公元2世纪帝国的巅峰时刻是历史上“人类最幸福和最繁荣的”时期。

爱德华·吉本不知道的是，这一好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宜人的气候。正如凯尔·哈珀(Kyle Harper)在其著名的《罗马帝国的命运：气候、疾病与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公元前200年—公元150年如今被称为是罗马气候最适



宜的时期，温暖、湿润和可预测的气候特别有利于帝国主要农作物的生长。

但到公元3世纪时，气候变得更冷、更干燥、更难以预测，干旱和作物歉收的情况更加频繁。到公元5世纪中期，古典时代末期小冰期（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到来。

气候变化降低了帝国对包括流行病在内的各种冲击的抵御能力。公元2世纪天花爆发，随后在公元3世纪爆发了一场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致命疫情。在公元6世纪中期，查士丁尼瘟疫——第一个已知的黑死病——可能导致帝国一半的人口丧命。

近期的证据证实了气候变化的作用。在瘟疫爆发前的十年间欧洲遭遇了2000年来最寒冷的气温，这是由一系列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所造成的。这很可能迫使沙鼠和土拨鼠离开它们在中亚的自然栖息地，导致它们所带来的携带细菌的跳蚤感染了黑鼠，而这些黑鼠顺着罗马庞大的贸易路线网络激增。

可以肯定的是，罗马的灭亡有诸多原因。它可能仍然是人类历史上由最多因素决定的一个事件。但似乎越来越清楚的是，影响人类世界的自然世界是罪魁祸首。

被这些不利的自然力量削弱，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开始瓦解。这一时期政治持续不稳定，边境压力大，货币贬值导致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在公元4世纪经济真正复苏之后，自然环境再次出手——欧亚大陆的严重干旱促使匈奴人迁徙，哈珀（Harper）称他们为“马背上的气候难民”。这开启了罗马边境大规模迁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时灭亡。紧接着，在公元6世纪时发生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作物歉收、灾难性瘟疫和毁灭性战争的恶性三重奏。正是在这个时期，罗马的人口减少到仅仅2万人，而古罗马广场也沦为牧场（campo vaccino），即奶牛的牧地。

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都因未能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检验而衰落。这种失败是如何发生的为我们这

个时代提供了警示——历史悠久的社会规范的崩溃、由经济不平等驱动的根本性的政治两极分化、精英阶层对共同利益的摒弃以及导致疾病和灾难的环境破坏。

我们应将这一教训铭记于心，特别是历史以可怕且令人不安的旋律回响时。这表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紧迫性，即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全球呼吁。罗马的经历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可能面临的未来。

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都因未能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检验而衰落。

当然，我们的经济与古罗马经济相比有一些重要的区别。我们的经济更富裕、更健康、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罗马人没有能力消除所有形式的物质匮乏，尽管他们能够而且应该更好地处理因自身的全球化而产生的不平等。而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两点。

另外，我们也有能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气候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迄今为止面临的巨大挑战。罗马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大自然的摆布。他们的活动并不是引起气候变化的驱动力，因此他们无法减缓或阻止气候变化。但是，由于今日的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可以通过改变我们自身的行为来解决——在未来30年内建立一个零碳排放的能源系统。

最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具有持久的重要性——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公元前130年、530年，还是2030年。^{FD}

安东尼·阿内特（ANTHONY ANNETT）是IMF信息交流部主任助理，约翰·列普斯基（JOSHUA LIPSKY）是IMF信息交流部高级信息官员。

最低工资是否能让工人受益？

过高的工资可能促使雇主裁员

皮亚蓬·索德里维波、加布里埃尔·苏鲁尔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最低工资，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一些国家（如法国）设定了一个全国普遍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其他国家（如新西兰和南非）则对行业和工人的类型加以区分。通常，最低工资由政府制定，并在与企业 and 劳工组织协商后进行定期修订（见图）。

基于道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理由，最低工资制度是合理的。但最重要的目标是增加收入、改善低端阶层工人的福利，同时减少不平等、促进社会包容。批评人士反驳说，最低工资非但不能改善福利，反而适得其反，因为它扰乱了劳动力市场。他们认为，还存在其他更具针对性、更少扭曲的方式来提供社会援助。

对福祉的影响

那么，提高最低工资是否真的能让低收入工人受益呢？这要视情况而定。

首先，雇主可能不遵守最低工资法。如果没有人真正拿到最低工资，或者法律几乎只停留于纸面，那么其影响便无关紧要了。例如，在影子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雇主通常会私下给工人提供工资补贴，有时被称为“信封付款”（envelope payments），以逃避税收或提供福利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可以通过减少信封付款来应对最低工资的增加，从而保持整体薪酬不变。雇主还可能少报雇员的工作时间，以保持总薪酬不变。

或者雇主可能根本不报告就业情况，以完全避开最低工资法。

其次，即便最低工资规定得到充分遵守，额外的收入也可能面临沉重的社会保障及劳动税，从而削弱由增加实得工资所带来的影响。最后，雇主可以通过减少福利、工作时间或裁员来削减成本，以抵消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影响。

对就业的影响

对就业的潜在影响是有关最低工资政策的辩论的核心，且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如果实施最低工资规定并将工资提升至高于市价，那么一些公司将不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并裁员；另一方面，市场可能没有竞争力。例如，如果公司是某特定市场的唯一雇主，那么它可能会制定低于竞争市场工资水平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可以在不降低就业的情况下提高工人的收入。实际上，较高的工资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工人，从而提高就业。

几十年来的研究尚未解决这一争论。一些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工人有着明显的好处，而其他研究则得出结论认为它是有害的。许多研究尚无定论。

尽管如此，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当最低工资设定在适当的水平时，仅对就业造成适度的负面影响。最近的研究普遍得出结论认为，增加最低工资导致的就业变化接近于零，尽管较弱势群体可能会受到伤害，如低技能和年轻工人。对于适度就业影响的合理解释是，在适当的水平，最低工资仅占雇主总成本的一小部分，因此企业除了削减工资外，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化解最低工资增加的影响，包括降低非工资成本、提高价格、提高生产率和接受较低的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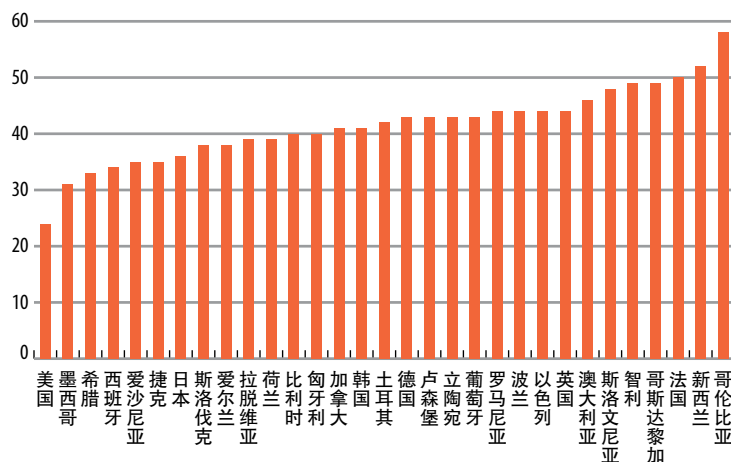
对不平等的影响

制定最低工资政策的另一个主要动机是通过减少处于工资分配底部的人数来缩小收入差距。实证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资确实会缩小工资差距，但这仅仅是大规模减贫政策努力的一部分。

勉强过活

最低工资占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百分比因国家而异。

(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注：截至2016年的数据。

然而，最低工资所能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最低工资设定得过高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因此带来不利的分配效应。当低收入者失去工作，不平等将扩大。此外，增加最低工资可能会提升整体工资结构，使收入差距保持不变，这是因为企业希望更高效的工人得到更好的补偿。

什么是合适的水平？

好吧，让我们假设最低工资制度有益且过高的工资标准有害。那么，最佳水平应该是多少呢？很少有研究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涉及此问题的研究将理想水平设定在平均工资的 25% 到 50%。在实践中，应调整最低工资政策，使整体工资增长与生产力增长保持一致。这就要求从政治家手中夺回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程序，并将其委托给独立专家。FD

皮亚蓬·索德里维波 (PIYAPORN SODSRIWIBOON) 是IMF亚太部高级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苏鲁尔 (GABRIEL SROUR) 是IMF非洲部高级经济学家。

公民身份与经济增长

包容性公民法往往能促进经济发展

帕特里克·埃米尔·伊玛目、康尼·波达尔



公民身份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历史上，忠诚的对象通常是一个民族或封建领主。随着 19 世纪单一民族国家的诞生，人们需要区分属于和不属于国家的人，从而在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建立了法律上的区别。大多数国家在那时或在独立时建立了“国籍规则”，其基本原则至今仍保持完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此规则定义了谁是国民，以及如何获得公民身份。公民受益于投票、在国内自由流动的能力以及工作资格等权利。他们也有责任，如在军队服役、纳税和投票。

现代公民身份的概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观点基于人权宣言，具有包容性，可以



将国籍扩展到满足某些条件的任何人。另一种观点更具排他性，将一个国家定义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具体来说，

- 包容性的观点反映在出生地法(属地主义, *jus soli*) 中，即在一个国家领土内出生的人自动获得该国国籍。在这种的观点(通常新大陆采用这种观点) 中，公民身份的纽带超越了血缘关系，而且包含了不同基因和地理背景的人。这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体系提供了基础，该体系可以确保新移民及其子女被接纳并轻松获得公民身份。

- 血统法(属人主义, *jus sanguinis*) 具有排他性，子女的国籍跟随父母的国籍，无论其出生地点。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非洲部分地区的情况通常都是如此。这种形式的公民身份更以民族为中心，而且从定义上来说包容性较差：公民身份的定义部分源自将非公民排除在基本权利和特权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国家，但却不是本国公民。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采用融合了这两种原则的公民法。虽然各国最初通常采用出生地法或血统法，但许多国家最近改变了其政策，转向另一种观点。1999 年，德国对其基于血统法的公民法进行了重大改革，使居住在德国多年的外国人，特别是在德国出生的外籍人士的子女获得德国公民身份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英国等国收紧了出生地法，不会自动给予在其国土上出生的人公民身份。下页的图展示了世界各地公民法的分布情况。

按地区划分的公民身份

在欧洲大陆，出生地法在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反映了封建传统将人们与他们的出生所在地的领主联系在一起 (Bertocchi and Strozzi,

2010)。大多数欧洲国家在 19 世纪根据这种模式起草了公民法。日本也是如此，以欧洲大陆的宪法为蓝本制定了本国宪法。

法国是个例外。法国大革命打破了这种封建联系，血统法占据上风。19 世纪末，法国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战败后恢复了出生地法以增加本国人口，并将外国社区融入进来，这一举措将有助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英国人在国内和整个大英帝国都保持了出生地法。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制度薄弱的国家，公民法很重要。

美国等国家选择了出生地法，对于移民国家而言，这是意料之中的。为了保护黑人奴隶的基本人权这一特定目标，1868 年美国宪法第 14 修正案确立了出生地法。美国公民身份相较于美国居民的利益有限也意味着为新移民提供公民身份的财政成本有限，以及新增额外工人的潜在好处。这个主题不仅仅与美国相关，值得单独进行考虑(教育成本由移民的母国承担；参见 Bertocchi and Strozzi, 2010)。同样地，人口稀少的大国加拿大以出生地公民法来吸引移民。

在殖民地国家，其公民身份法一般最初是从殖民政权继承而来的 (Bertocchi and Strozzi, 2010)。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国家，如中国、埃及和日本，通常难以获得该国的国籍或第二本护照。其他国家，特别是较新的西半球国家，加入该国国籍通常更加容易。

许多前英国、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地非洲国家缺乏民族凝聚力，在独立时对公民法进行了修改：大多数前法国殖民地最初都沿用出生地法；

世界各地的公民法

西半球国家传统上遵循出生地法，而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血统法占主导地位。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采用两者融合的方式。



出于种族因素的考虑，前英国和葡萄牙殖民地倾向于转向血统法。由于许多国家是在不考虑当地民族多样性的情况下人为组建的，导致政治不稳定，因此血统法被认为可以巩固民族认同感。

塞拉利昂就是这种情况。1961年，宪法将公民身份限制为只能通过血统传递，而且仅限于那些有非洲黑人父亲和祖父的人。但是在一个被迫迁徙的异质民族环境中，法律将各种民族和部落群体排除在外，造成疏离和冲突，特别是在制度薄弱的环境下。例如，1964年的刚果宪法为了排斥卢旺达移民，只承认其父母是1908年以前在该领土内建立的部落群体成员的人为公民（见 Bertocchi and Strozzi, 2010）。不出所料，其后果是造成部分群体的边缘化，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产生无国籍人士，他们之后可能会造反。

中经济体之间平均人均实际 GDP 的显著差异。2014年，前者的人均收入比后者高出80%。从样本中分类出采用非出生地法国家与血统法国家，结果证实那些采用出生地法的国家更为富有，但在比较采用混合制度与血统法国家时，则没有发现明确的模式。

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公民法可以被视为解决冲突或生成冲突的制度。若公民法具备包容性，则可以提供积极的社会资本，增强信任，缩减交易成本并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和强度。在其他解决冲突的制度缺乏有效性时（例如，政府腐败或法院薄弱）尤其如此，就像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那样。原则上，血统法使融合变得更加困难，从而损害了经济发展。

它可以通过若干渠道影响经济：

扭曲（和减少）投资：缺乏获得公民身份前景的投资者更短视，他们会留心过度暴露风险于单一国家，并且在选举期间变得谨慎——在制度薄弱的国家里他们尤其脆弱。此外，他们的投资

不同的影响

公民权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数据生动地阐述了采用出生地法的国家与采用非出生地法的发展

也是扭曲的。如果人们的财产权因其缺乏当地公民身份而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那么投资重心将放在回报快或者所需资本金有限的领域。例如，在柬埔寨和马达加斯加，外国人可能不会购买限制投资的土地。

政治不稳定和腐败：没有公民身份的少数群体往往处于两种极端——要么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要么在当地经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没有公民身份，边缘群体不能通过民主手段进行投票或影响公共生活。被剥夺公民权的群体通过抗议或暴力等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这可能会刺激政府压制这些少数群体，也许会增加军费开支，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相反，当一个非本国的集团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时，其缺乏国家保护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他们的脆弱性，有影响力的少数群体有动机去影响政治进程并可能诉诸贿赂，从而助长了腐败，削弱了制度。

降低公共部门效率：相关研究已经记录了种族、宗教或语言方面的分歧如何经常破坏公共部门的绩效，增加赞助，降低民众的信任，最终损害经济发展（见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扭曲劳动力市场：根据血统法，当地非公民少数族裔可能被排除在部分劳动力市场之外。在许多国家，移民被禁止从事全部职业。例如，在泰国，外国人不能成为理发师或会计师。在法国，欧盟以外的人不得成为殡葬公司的董事。在这些情况下，出生地法能够扩大血统法无法实现的劳动力市场，拓宽劳动力资源并提高经济效率。

我们的实证结果证明，即使控制了潜在的内部因素，公民法的差异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我们首先编制了一套新的公民法数据集，然后测算公民法是否可以部分解释各国人均收入的显著差异。我们发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在制度薄弱的经济体，公民法很重要：出生地法在本质上更具包容性，鼓励同化和融合，对收入水平具

有重要的统计学意义和正面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2014 年改用血统法的国家的人均收入要比保留自独立后的出生地法的情况低约 46%。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在采用血统法的国家，通过婚姻和入籍的方式获得公民身份较为容易，从而缩小了与采用出生地法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这表明在获取公民身份的道路上存在一些可替代性。

增进融合与促进增长

关于公民法的争论在过去几年中愈演愈烈，不仅在发达经济体，在发展中经济体也是这样。我们证明了这些法律对低收入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更为实质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它们的制度更为薄弱且不一定能抵消具有排他性的公民法的负面影响。

政策影响虽然存在细微的差别，但影响明显。在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多地输送移民和接收移民的时代，有效整合这些人口可以刺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前殖民地国家，血统法已经损害了发展。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从血统法转变为出生地法可能会增进融合并促进经济增长。

帕特里克·埃米尔·伊玛目 (PATRICK AMIR IMAM) 是 IMF 驻津巴布韦的代表。康尼·波达尔 (KANGNI KPODAR) 是 IMF 战略、政策和审查部的副处长，同时也是位于法国克莱蒙费朗的国际发展研究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Studies and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的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 Bertocchi, Graziella, and Chiara Strozzi. 2010. "The Evolution of Citizenship: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3:95–136.
- Easterly, William, and Ross Levine. 1997.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1203–50.
- Imam, Patrick A., and Kangni Kpodar. 2019. "Does an Inclusive Citizenship Law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MF Working Paper 19/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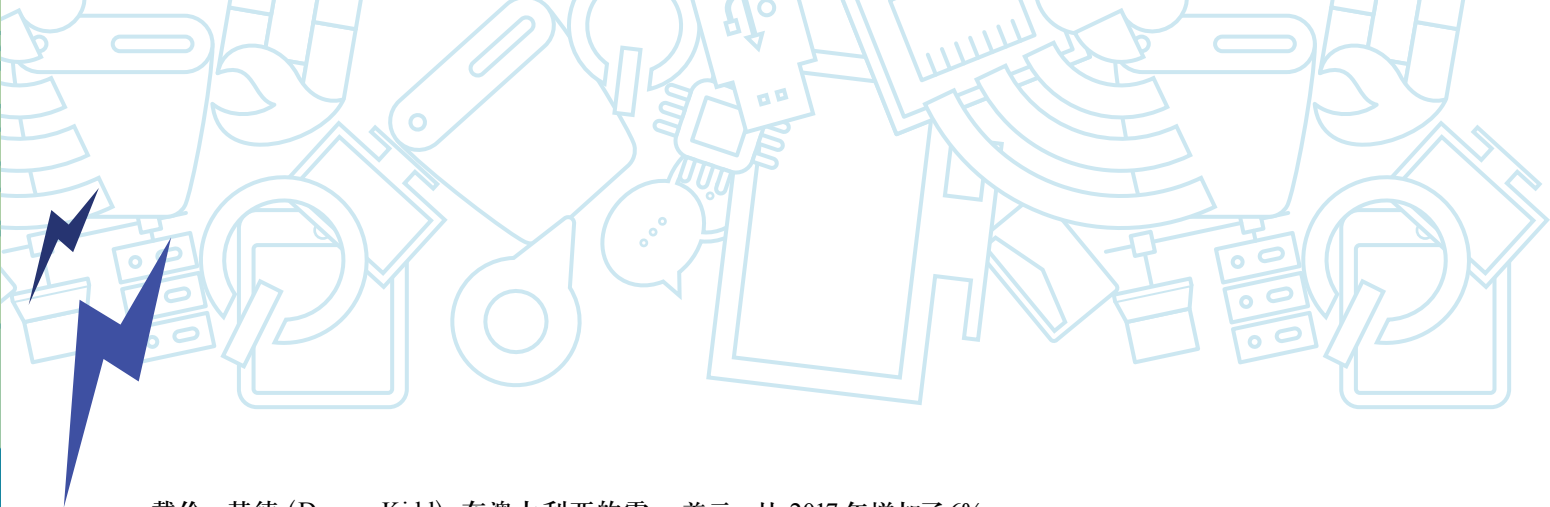




高科技人才争夺战

世界各国对有限的高科技人才的争夺日趋白热化

佩德罗·尼古拉西·达科斯塔



戴伦·基德 (Darren Kidd) 在澳大利亚的雪佛龙技术支持部门工作，年薪高达六位数。他从未有过海外工作的经历，也没打算将自己的小家庭从位于澳大利亚西海岸的珀斯迁往别处。

在位于澳洲大陆和塔斯曼海对面的新西兰惠灵顿，出现了大量羽翼未丰的初创企业，它们正努力吸引大量掌握各种技术的高科技人才。因此，政府官员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能吸引像基德这样的科技人才及其家庭前来这个岛国定居。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吸引 100 名高科技人才及其家庭前来新西兰首都亲自参加知名高科技公司的面试。来自 28 个国家的超过 4.8 万人递交了求职申请。

起先，基德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去距离自己家乡 9 小时航程的地方定居。但是，他发现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这里的初创企业和云计算领域提供了很多有趣的工作。“与我调查过的很多珀斯的公司相比，这里有着更令人激动的前景。”这位 32 岁的科技人才在 8 月举家迁往惠灵顿，成为施乐有限公司 (Xero Limited) 的一名研发人员。这是一家总部设在惠灵顿的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会计软件公司。如果将生活成本的差距纳入考量，他的薪水与在澳大利亚时几乎一样。但是，新西兰首都在积极接纳科技人员、帮助其家庭适应新环境以及保证生活质量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成为吸引基德的主要因素。

企业正在探寻自己的财富和未来，而这些与它们吸引有限的合格科技人才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未来数年间，随着科技的影响持续拓展到不同行业，这种人才短缺的局面将会变得更为严峻。加特纳公司 (Gartner Inc.) 是一家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全球性调研公司。据该公司估算，去年的全球科技支出攀升至 3.7 万亿

美元，比 2017 年增加了 6%。

荷兰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兰德斯塔德 (Randstad NV) 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 2016 年，美国科技岗位数量比合格科技人才数量要多出大约 300 万个。洛杉矶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光辉国际 (Korn Ferry) 指出，到 2030 年，全球科技人才的缺口将超过 8500 万人，年收入将损失 8.5 万亿美元。

根据光辉国际的预测，遭受冲击最大的经济体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其中每个国家面临的人才缺口都高达 1800 万人。就美国和俄罗斯而言，其人才缺口预计达 600 万人，而中国的人才缺口达 1200 万人。

“这是一个供需问题。”光辉国际的副董事长艾伦·瓜里诺 (Alan Guarino) 说：“企业正在提高工资，招聘更多的人才，但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仍然短缺。科技如同贯穿企业各个方面的一条主线。”

各国正在探寻自己的财富，而这与它们吸引有限的合格科技人才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随着科技渗透到越来越多的行业之中，经济风险越来越高。尽管行业内的就业并无明显的增加，但据专业服务公司普华永道提供的数据，1980 年以来科技在美国 GDP 中所占比例大幅增加，增幅达五倍之高，这表明了生产力提升的幅度。自经济大衰退以来，全球生产力的增长放缓。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一直很强劲，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瓜里诺说，市场对数据科学家、软件工程师、程序员和云计算专家的需求很大。这一点不仅体现





在 IBM 和思科这样的软件公司和传统的科技巨头上，也体现在零售企业和金融公司、领军企业以及很多在招聘新人才的方式上越来越大胆和创新的城市中。

政府也在积极行动起来。校区、城市，甚至于整个国家都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通过推出有针对性的财政激励政策（包括提高工资和减税优惠），纷纷从其他地方挖人才。政府官员越来越意识到，科技的迅猛发展让自己落后的机率大大增加。事实上，人才竞赛也成为公共职能重要的一部分。

最近发生了一件备受关注的事情。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在竞争成为亚马逊第二总部园区所在地。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地方政府和开发署纷纷推出了新的激励政策。最后，亚马逊的选择基本是意料之中，因为所选城市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亚马逊从自己选定的城市（纽约市和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获得了 25 亿美元的资金奖励，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人才战的激烈程度。由于当地某些官员的反对，亚马逊后来放弃了在纽约建立基地的计划。

在国家层面上，像以色列和波兰这样的国家已经成为科技人才招聘方面的成功范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拥有雄厚的国内科技人才储备。以色列有时被称为“初创企业之国”，其人均初创企业的数量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波兰也拥有强大的初创公司群体，同时还具备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其中很多人都会讲英语。由于这些优势，谷歌于 2016 年在华沙建立了新园区。

饱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希腊正在与多个风险资本家合作，通过投资本土高科技企业来实现经济的复苏。总部设在雅典的马拉松风险投资公司（Marathon Venture Capital）12 年来一直在投资希腊的初创企业。该公司在 2018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本土的人才储备正在引起甲骨文、三星和思杰等跨国高科技公司的关注。这些科技巨头都收购了希腊的高科技企业。

葡萄牙为高科技人才和企业家提供居住权，而且有望最终为其提供公民身份。印度目前已成为很多跨国公司（如微软和思爱普软件解决方案）以及本土高科技企业（如塔塔咨询服务）的科技中心。而且印度为

信息技术、电信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下一代员工提供各种培训项目，借此来保持其优势地位。2015 年，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发起了一项包含内容广泛的项目“技能印度”，意在培养年轻一代的高科技技能。

中国的情况可谓喜忧参半。虽然中国每年有数百万的青年学生出国接受中等教育，而且很多学生接受了科技领域的培训，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吸引这些学生回国工作方面收效不大。语言和文化障碍也使得中国在吸引海外人才时更加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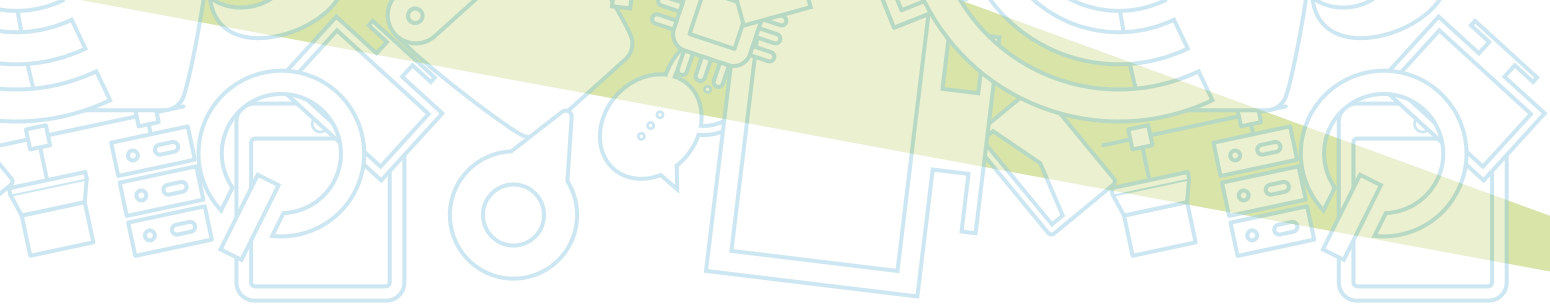
在欧洲，高科技企业的命运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走势密不可分。在 2012 年欧债危机期间，欧洲经济持续动荡，但自那以后已经复苏。葡萄牙企业家佩德罗·普雷萨（Pedro Presa）四处考察，想要寻找一座最合适的城市来启动自己梦寐以求的项目足球视频流媒体服务公司 Mycujoo。他将自己的选择范围缩小到三座城市：伦敦、柏林和阿姆斯特丹（普雷萨当时身在苏黎世，但他很清楚自己不想留在那里）。

很快，他排除了前两座城市。用他的话说，在那里组建新公司的成本太高。他最后选择了荷兰。在那里，外国员工可享受 30% 的个人收入免税的待遇。这样一来，他可以轻松地招聘到高技能的员工。

普雷萨说：“得益于这项 30% 的免税规定，让这里变得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可以招聘到很多侨民。”他补充道，与瑞士等有移民工人配额的国家相比，这里也更容易招聘到工人。

2014 年，他开设了一家商店，但他一直希望能回到葡萄牙，在那里经商。2016 年，这个机会出现在他眼前。当时，葡萄牙摆脱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开始制定新的刺激政策，为的是吸引像普雷萨的公司这样的企业。同时，荷兰经济的走强意味着国内对工人的争夺战更加激烈。除了采取其他措施之外，葡萄牙从今年起开始为任何愿意至少雇用 10 名员工的企业主，或者是向当地经济进行其他重要投资的企业主提供取得欧盟护照的机会。

两年前，普雷萨的公司米库朱（Mycujoo）在里斯本开设了办事处。该办事处现有 18 名员工。他计划明年再雇 30 名员工。



世界上有些国家或地区既无具有竞争力的工资，也无诱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无法吸引那些技术熟练的员工。

他说：“政府一直在跟我们讲，只要我们追加投资、招聘员工，政府就有可能为我们制定财政激励措施。”他补充道，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回到里斯本。“葡萄牙的生活质量很高，但生活成本并不高——因此，它吸引了很多人去那里定居。”

世界上有些国家或地区既无具有竞争力的工资，也无诱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无法吸引那些技术熟练的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就只能去挖掘远程员工人才库。这些人才可能无需为了更换工作而移居他国。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基辅的一家信息技术招聘公司乌克兰科技(UkraineTech)的董事总经理伊戈·鲁宾斯坦(Igor Rubenstein)指出，依赖远程员工会使跨国企业相互间抢夺人才变得更加容易。他说，毕竟“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信息技术员工短缺的问题。”

在无法从海外招聘到科技人才时，有些企业和政府正在努力培训自己的员工。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指望谷歌能培训 1000 万名高技能工人。自 2017 年 3 月起，这家高科技巨头启动了一项免费培训计划，希望能消除富国与穷国之间所谓的“数字鸿沟”。当地人说，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服务，但完全免费，而且市场需求很大，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2010 年，努布斯·厄可奎(Ndubuisi Ekekewe)在尼日利亚创建了一家电子设计公司，而这项计划则有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熟练工人短缺的问题。

作为第一大西洋半导体及微电子公司(First Atlantic Semiconductors & Microelectronics)的创始人，厄可奎表示很少有当地人掌握他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有这种专业技能的当地人要么在薪资很高的外资初创企业中工作，要么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他补充道，从其他大陆招聘高技能的工人通常并不可行，毕竟提供国际水准的工资并非易事。

他的解决方法就是与本土大学合作，举办研习班，开设相关课程，以便使新员工在经过培训后有能力运

用公司最新的技术，其中包括有助于农民提高生产效率的传感器。

“他们一毕业就会进入我们的公司。”厄可奎说，“我们为他们提供了新兴技术的路线图。”

但是，他认为这种解决方案会带来新的挑战：如何避免投入了很多精力培养出来的人才被那些寻找熟练工人的跨国公司挖走。

有时，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在多名员工被挖走后，他将公司总部由拉各斯迁往奥韦里。这座城市有 120 万居民，距离首都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航程。在奥韦里，公司面对的竞争对手较少，而且交通和污染问题远不及拉各斯那么严重。他说，离开首都还有一个优势：他的设计和技术团队被企业猎头挖走的可能性降低。

在惠灵顿，城市管理者正在采取相反的方法：出钱安排基德和其他员工坐飞机过来，与来自很多不同企业的猎头见面。惠灵顿地区经济发展局的总经理戴维·佩克斯(David Perks)表示，尽管各家公司都在想法设法地争夺相同的人才，但是这项计划成功地吸引了数千名合格的求职者。

佩克斯表示，与施乐公司这样的国内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这项计划能否从全球各地吸引合格的求职者。

美丽的环境，如湛蓝的海滩和绿树环绕的山顶，也不失为一大优势。基德说：“在天气好的日子里，惠灵顿是最美的。”如今他觉得新西兰有了家的感觉。FD

佩德罗·尼古拉西·达科斯塔(PEDRO NICOLACI DA COSTA)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联络主任。他曾在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和《商业内参》担任过财经记者。



性别差距一瞥

女性在很多领域仍然落后于男性，而科技领域出现了显著的差异

性别平等不仅是正确的，同时也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一份新的报告，在实现两性平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8 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表明，女性总体上实现了 68% 的平等，还有 32% 的差距。这份报告从四个主要方面衡量性别差距：经济参与和机会、受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政治赋权。

在领导力方面，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全球层面来看，仅有 18% 的部长和 24% 的议员是女性，而且由女性担任的管理者职位仅占 34%。从更广泛的经济权利角度来看，女性与男性在控制金融资产以及花在做家务和其他无报酬事务上的时间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

报告还指出，人工智能（AI）相关技能方面的性别差距更是令人堪忧。人工智能专业人士中女性仅占 22%，男性占 78%。这一结论的含义值得我们注意。首先，由于人工智能技能日渐重要，因此这一技能方面的差距将加剧未来的性别差

距。其次，各领域的技术开发并没有多元化人才的参与，这限制了其创新能力和包容能力。再次，女性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低融合度意味着错失巨大的机遇：全世界都无法承担剥夺女性在这一领域的权利所带来的后果，而且这个领域的人才本就非常稀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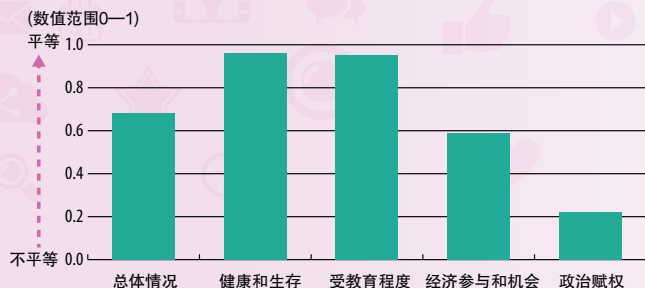
因此，为了保持竞争力，各国应将性别平等置于优先位置。报告揭示了那些能在男女之间更公平地分配资源的国家，不论其总体资源水平如何——它们在其所在地区或收入组别中属于领头羊，是潜在的榜样。^[1]

本文由IMF信息官员李丽军撰写。本文的内容和图表基于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全球概况

按区域划分的性别差距分数

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正在缩小，但政治和经济赋权方面的性别差距依然很大。



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冰岛一路领先，随后是其北欧邻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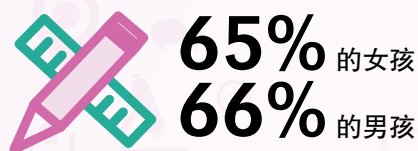
国家	全球指数	
	排名	得分 (0-1)
冰岛	1	0.858
挪威	2	0.835
瑞典	3	0.822
芬兰	4	0.821
尼加拉瓜	5	0.809
卢旺达	6	0.804
新西兰	7	0.801
菲律宾	8	0.799
爱尔兰	9	0.796
纳米比亚	10	0.789

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

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已基本实现

全球中等教育入学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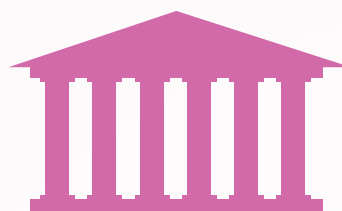
.....但是学院/大学的入学率却很低。



此外,有44个国家**20%**的女性是文盲。

.....但是挑战依旧存在

在所评估的149个国家,政治赋权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严重.....



女性代表的数目:

17 个国家元首

18% 的部长

24% 的议员

34% 的管理者

.....经济赋权方面的情况也一样。



仅有**60%**的所调查国家,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的金融服务。



仅有**42%**的国家,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的土地所有权。



在可获得数据的29个国家,女性花在家务和其他无报酬事务方面的时间是男性的**2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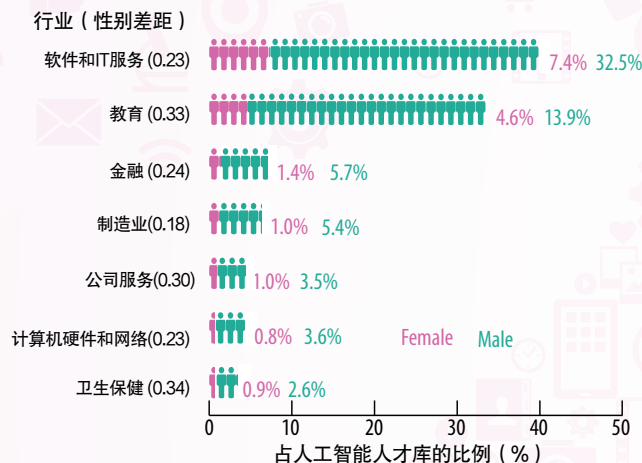
新的性别差距正在未来工作领域逐渐显现

女性在人工智能和其他需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的职业方面严重不足。

即便在那些拥有最大人工智能人才库的国家,人工智能专业人士方面的性别差距依然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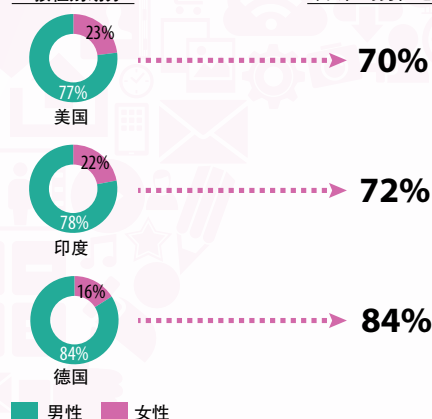
人工智能工作者的分布情况

人工智能工作者中女性的占比为22%,但不同行业的性别差距不同。



占人工智能技能专业人士的比例,按性别划分

性别差距 (女性对男性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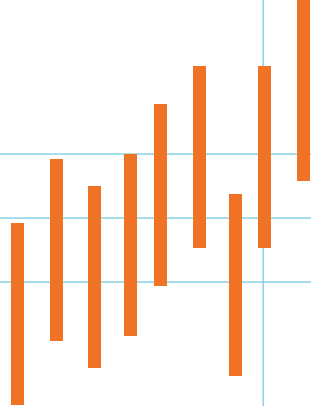
让人捉摸不透的 增长预测

随着巨大的技术变革不断推进，为什么长期
增长预测却变得更加悲观？

M.艾汉·高斯、弗朗西斯卡·奥恩佐格和菅原直孝

过去十年间，有关技术创新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已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有人声称，在未来十年里，受益于新技术的出现，生产率得到提高，全球经济将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迎来一次激增（Brynjolfsson and McAfee, 2014；Mokyr, 2018）。另一些人则告诫大家，未来的增长将停滞不前，或者甚至会呈下滑之势，这是因为新技术对生产率的边际效应可能逐渐减弱，而且老龄化和投资增长疲软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将会为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一层阴影（Gordon, 2016）。

就新技术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整体影响而言，对其进行可信的定量分析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却并非易事。然而，长期增长预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随着机器学习、云计算、机器人技术和智能手机等新技术的普及，这些预测有望在一段时间后变得更准确。但是，数据能证明这一点吗？在研究中，我们分析了技术快速变革期内长期经济增长预测的变化，为的是评价这种技术变革对未来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Kose, Ohnsorge, and Sugawara, 即将发布）。



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共识经济学 (Consensus Economics) 公司发布的预测报告。这家公司每年都会对专业预测人员进行多次调查,以形成其经济年度长期(6—10年)增长预测。共识经济学的预测反映了很多使用各种预测方法的机构的看法,因此其预测结果要比单个机构做出的预测更能经得起潜在不确定因素的考验。我们的样本包括1998—2018年对20个发达经济体以及18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占全球GDP的大约90%)进行的长期预测。

日益悲观的预测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长期预测不断下调。2010年预测的全球经济增速是:到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3%。到2018年,对长期经济增速的预测降低至2.5%(见图1)。2007—2018年对各国长期经济增速的预测平均下调了1.4个百分点。对于这种日益悲观的经济预期,我们目前的解释是预测者未能充分地认识到新技术在未来十年间所创造的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预期的转折点。1998—2007年长期预测的平均值从3%增至3.4%,我们的研究中所涉及的几乎一半经济体的经济都出现了增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出现了增长前景越来越乐观的局面,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达经济体的预测已经开始下调。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期短暂的上调之后,对发达经济体的长期预测在21世纪初再次出现逐渐下滑之势。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对这

相对于经济增长结果,经济增长预测多次被证明过于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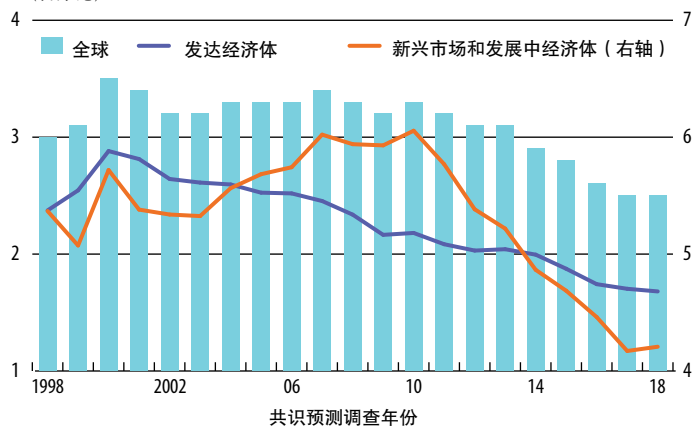
两类国家的预测都出现了明显恶化。对于长期增长预测,尽管其速度和强度各异,但后危机时代的疲态在其他衡量标准(包括人均收入、投资和消费的增幅)中也显而易见。

危机前上调长期预测和危机后的下调长期预测在众多大型经济体中普遍存在。例如,1998年预测美国经济在2008年的增幅将接近2.4%。可到2008年,长期增长预测向上修正了0.3个百分点。同样地,1998年,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

图1

阴云密布, 逆风而行

自2010年起,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测持续走弱。
(百分比)



资料来源: Consensus Economics; 世界银行。

注: 样本包含38个在1998—2018年能持续获得共识预测的国家(20个发达经济体以及18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每年开展的多项调查的年度平均预测值。按2010年定值美元测定的GDP加权后, 计算得出经济增长总量。

预计经济增长将进一步下滑，而不会出现技术驱动的生产率的提升。

的增长将达到 7.5%。在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年的强劲增长后，到 2008 年，其长期预测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相对于十年前的预期，尽管 2008 年对巴西和印度的长期预测有所上调，但这种上调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到 2008 年，这些经济体的长期增长预测都下滑了 0.3—2.4 个百分点，低于 1998 年的水平。

坐过山车

长期预测的变化体现了全球经济在过去 20 年间经历的过山车式的涨跌。危机前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历史无前例的扩张，某些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快速发展，因此增长前景强劲。2003—2007 年全球经济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

代初以来最快的增长期。然而，在 2009 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顺风变成了逆风，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缓慢复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在 2010—2015 年间，2011—2012 年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进一步影响长期的经济前景，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商品价格低迷所造成的。

长期增长预测趋缓也反映出人口变迁、投资前景以及生产率趋势相关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侵蚀着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满负荷和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全球经济增速。2013—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比十年前大约低了 1 个百分点，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生产率增长乏力、投资增长低迷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

十年前做出的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预测都高于 2008—2018 年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速，2010 年除外（见图 2）。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长期增长预测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即便是在 2010 年，对于大约一半的发达经济体和 1/4 的其他经济体的预测也显得过于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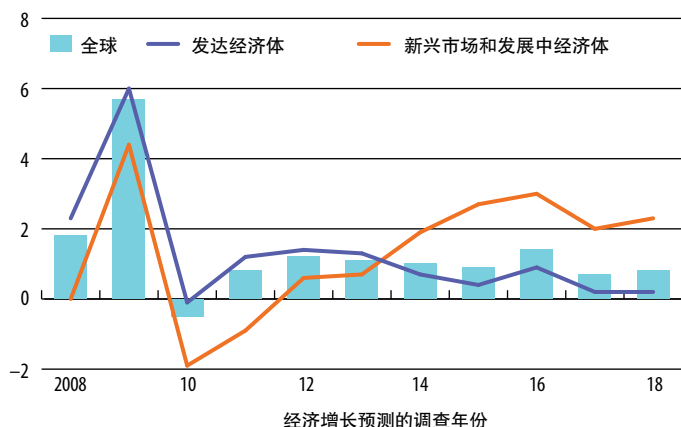
此处的分析主要涉及危机时期和危机之前，而在这些时期，经济增长受到了一系列极不寻常的消极冲击，但预测中过于乐观的态度已得到普遍的证明。相对于经济增长结果，经济增长预测多次被证明过于乐观（Ho and Mauro, 2015）。而且，随着投资期的拉长，乐观程度往往会越来越明显。一般来说，长期增长预测会超过实际增长 1.2 个百分点，而在 2018 年之前，提前三年做出的预测会比实际增长高出 0.7 个百分点。

由于长期增长预期可从周期效应中提炼而出，因此这些预期应该能反映预测者对于经济潜在增长的判断。果真如此吗？对于全球增长的长期预测通常会高于对随后 10 年间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的预测。我们观察到的这些现象表明，尽管在

图2

乐观的态度

除2010年以外，每年的全球经济长期增长预测结果都被证明过度乐观（百分比）



资料来源：Consensus Economics；世界银行。

注：整体组的预测误差是指10年前共识产出预测（例如，对于2008年来说，指的是1998年做出的预测）与实际增幅（按横轴的年份计算）之间的差额，并经2010年定值美元测定的GDP加权。参考图1中的注释，以了解样本规模。

后危机时期长期经济增长预测变得更加悲观，但相对于最终的经济增长以及潜在的经济增长预测，长期经济增长预测一直显得有些乐观。

在经济持续强劲增长阶段，长期预测通常会更加乐观。换言之，如果生产率、就业和投资增长率长时间持续走高，那么增长预期通常也会走强。

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徘徊

就目前而言，预测者似乎对未来十年间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持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更符合技术悲观派而不是技术乐观派的看法。经济增长预计将进一步下滑，而不会出现技术驱动的生产率提升。这种悲观的态度体现了一种认识，即生产率增长乏力、越来越不利的人口趋势以及投资前景黯淡，这些都有可能在未来数年间给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造成压力。

当然，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年代，对于越来越悲观的预测可能存在其他解释。首先，预测者可能是根据最近生产率增长缓慢做出的预测，但这项指标可能存在低估的问题，毕竟出现测量误差是常有的事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 在总结测量问题时指出：“计算机时代的影子随处可见，但生产率统计是个例外。”

其次，预测者可能无法预测重大技术变革对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的影响，因为这类变革（如电力和汽车的大规模应用）非常罕见。当这些变革发生时，它们对总量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是逐渐显现出来的。而且，如果要定量分析技术变革对增长前景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改进计量分析工具和数据，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两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下滑归结为缺乏有效的信息。

第三种解释没有那么美好：不利的人口趋势带来的结构性逆风因素、投资增速放缓以及由于现有技术的广泛应用而造成的生产率停滞不前，这些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前景下滑，即便是新技术

带来的生产率大幅提高也无法实现经济长期强劲增长。这可能意味着新技术目前仍不够成熟，无法广泛地用于商业领域，而且它们的扩散需要较长的时间，具体时间并不确定。这可能也体现了企业推行新技术时面临着诸多困难，如融资限制以及员工的技能有限。

不妨将这些解释暂且搁在一边。如果过往的表现能说明一些问题，那么即便经济增长像过去20年一样让人失望，但这些愈发悲观的长期预测最终也会变得乐观起来。有一点很清楚：充满希望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取决于所测量的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而弥补全球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障碍。

技术的迅猛发展最终会带来一个全球繁荣的新时代。然而，各国决策者们不能坐等这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是现在就行动起来，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增强自身经济的增长潜力。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有句名言：“计划无足轻重，但计划就是一切”。本着这句名言的精神，政府应未雨绸缪，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尽管新科技产生的实际影响目前仍是未知数。这要求我们现在就大刀阔斧地推行各项新举措，加快新技术增长效益的落地。这些新举措包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促进新技术的应用，同时完善制度和法规，进而满足技术变革的需要。 FD

M.艾汉·高斯 (M. AYHAN KOSE) 是世界银行发展展望组主任，弗朗西斯卡·奥恩佐格 (FRANZISKA OHNSORGE) 是该组的主管，菅原直孝 (NAOTAKA SUGAWARA) 是该组的高级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 Brynjolfsson, Erik, and Andrew McAfee. 2014.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Gordon, Robert J. 2016.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Ho, Giang, and Paolo Mauro. 2015. "Prognosis: Rosy." *Finance & Development* 52 (1): 40–43.
- Kose, M. Ayhan, Franziska Ohnsorge, and Naotaka Sugawara. Forthcoming. "Global Growth Next Decade: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Disappointing Outcom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Mokyr, Joel. 2018. "Building Taller Ladders." *Finance & Development* 55 (2): 32–35.



联合国
粮食及
农业组织

努力实现 #零饥饿#



粮农组织的“世界状况”系列出版物提供了对当今世界最紧迫全球问题和挑战的全面概述。

可获以下语言版本报告：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语

可于各主要平台获得电子书



欲获更多信息
fao.org/publications
publications-sales@fao.org



世界渔业和 水产养殖状况

ISBN 978-92-5-130691-8
价格: 75.00美元



世界森林状况

ISBN 978-92-5-130725-0
价格: 65.00美元



2019年版
9月即将出版

世界粮食安全 和营养状况

ISBN 978-92-5-130844-8
价格: 36.00美元



2019年版
10月即将出版

粮食及农业状况

ISBN 978-92-5-130974-2
价格: 56.00美元



农产品市场状况

ISBN 978-92-5-130838-7
价格: 36.0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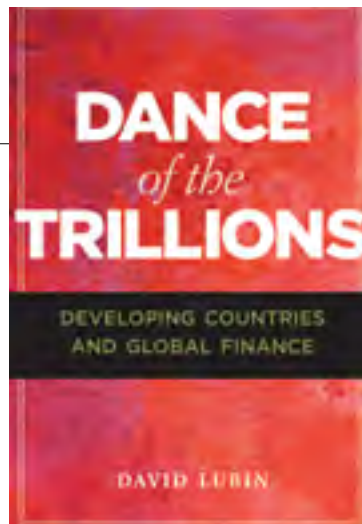
动荡时期

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戴维·鲁宾 (David Lubin)，对于他作为新兴市场首席战略家的研究工作充满钦佩之情。如今，各国市场充斥着令人心烦意乱的波动起伏。2018 年，新兴市场出现的大规模抛售便是很好的例证。戴维的分析和呼声我们从新的角度去深刻认识这个动荡的时期。

《万亿之舞》(Dance of the Trillions) 追溯了全球资本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流入和撤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内容包罗万象，文笔流畅。书中谈及了热钱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埋下的祸端，有效的汇率管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经济稳定的假象 (情况通常恰恰相反)，以及在众多驱动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周期的主要因素中，美国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后一种观点尤其切合当下的局势，毕竟我们处在长达十年的强劲的货币刺激周期的收尾阶段。尽管极其缓慢，但这种刺激目前正在放松。

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除此之外，新兴市场面临着一连串的挑战。这些挑战会影响它们在未来数十年的发展。首先，有些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保护主义倾向。这种保护主义思潮的根源在于它们认为全球化似乎给新兴市场带来了太多利益，却让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次，科技进步势不可挡。这可能会使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工作退出市场。例如，随着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跑鞋的生产过程，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工资差异不断缩小，因此这种商品的生产从新兴市场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有些人认为，这种影响可能是新兴经济体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再次，过去十年间，世界三大经济体强劲的货币刺激政策为新兴市场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资金流入，但同时也可能使其产生前所未有的脆弱性。

这本书提出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国际金融界的人士经常争论的问题，那就是未来数年中国在



戴维·鲁宾

《万亿之舞：发展中国家与全球金融》

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 查塔姆研究所，华盛顿特区和伦敦

2018 年，154 页，34.99 美元

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中美两国近来出现的贸易紧张局面便反映了长期的贸易不平衡以及各方未能主动解决这种不平衡的局面。

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除此之外，新兴市场面临着一连串的挑战。

除了鲁宾的书中涉及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系列其他问题，如在地缘政治方面，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其中一个产物) 向更为两极或多极世界的方向发展，而这将会使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身处何种境地呢。各方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有关受援国的债务和缺乏知识转移的问题可谓反响各异，这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与“华盛顿共识”相比，中国的商业模式是否会面临同样的或者更加多的审视。FD

罗宾·布鲁克斯 (ROBIN BROOKS) 是国际金融研究所执行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

征 税

征税一直是很多非洲决策者记挂在心的事情。这样做无可厚非。有个好消息是，某个中等收入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将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大约 14% 提高到了 2016 年的 18% 以上。然而，税收收入仍无法满足政府的各项开支，整个非洲大陆的国债都呈上升之势。展望未来，IMF 估计要想在 2030 年时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多低收入国家还要拿出 14% 的 GDP 用于政府支出。同时，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寻找“援助之外”的发展资金。有办法来实现这些目标吗？

在《非洲各国的税收状况》(Taxing Africa) 一书中，米克·穆尔 (Mick Moore)、威尔逊·普里查德 (Wilson Prichard) 和奥德-赫尔吉·费吉尔德斯塔德 (Odd-Helge Fjeldstad) 回顾了非洲各国的税收史，让人备受启发，同时还描述了当前的发展情况。凭借着作者在提供有关政府的税收政策及税收管理方面咨询的极其丰富的经历，他们提出了很多增加税收的建议，但并未列出具体的条条框框。

这本书首先简单回顾了非洲税收制度的发展历程。这种税收制度根植于殖民主义。当时，主要是向非洲人征税，目的是迫使工人们进入金钱经济，使其

为欧洲的农场或矿山工作。即便在今天，有些税目仍与这个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在非洲各国独立后，各国政府转而向农业和矿产出口征税，以期发展本国经济并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非洲各国逐渐走上了一条更加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放弃了主要对出口商品进行征税的做法。

如今，非洲各国的税收制度既包括直接计征的个人和企业所得，也包括间接计征的消费税，如增值税。然而，作者注意到，地方税收的增长空间受限于公民在接受基本服务时必须进行的行贿。他们还指出，在向富有的和有影响力的公民征税时存在很多问题。最后，很多国家——不仅限于非洲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向跨国企业征税。这些企业利用各种复杂的策略，将企业收入转移到避税港。

那么，怎样才能加强征税工作呢？作者认为，随着非洲各国税收征管部门的经验日益丰富，它们有能力制定并实施更有效的税收制度。卢旺达和乌干达就是很好的例子。令人遗憾的是，税收主管部门遭到阻碍改革进程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一股政治制衡力量正在出现。公民社会开始支持调动收入 (revenue mobilization)，力图完善公平、公正、互惠和问责制。在这种背景下，作者指出很多非洲国家政府能通过说明税收收入的支出情况，更好地解释征税的必要性。

《非洲各国的税收状况》是一部很好的书，它从多个角度探讨了非洲各国的税收以及增加税收所面临的挑战。这本书语言通俗易懂，能让任何对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感兴趣的读者受益匪浅。作者提出的观点——非洲各国领导人正努力探寻适合非洲现状的解决方案——让人备受鼓舞。然而，那些有政策意识的读者可能会看重一些有关政府举措的更为具体的建议。F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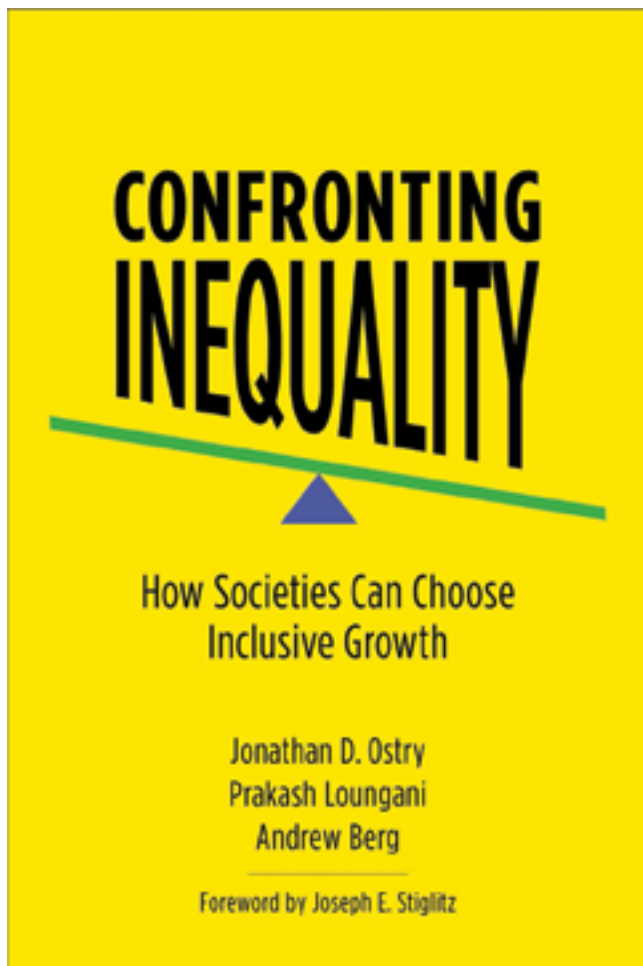
阿克塞尔·施梅芬尼 (AXEL SCHIMMELPFENNIG) 是 IMF 非洲部的处长。



米克·穆尔、威尔逊·普里查德、奥德-黑尔格·菲耶尔斯塔德

《非洲各国的税收状况：
强制、改革及发展》

Zed Books 出版社，伦敦
2018 年，288 页，24.95 美元



直面不平等

社会如何选择包容性增长

**Jonathan D. Ostry、
Prakash Loungani
和 Andrew Berg**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作序

“Ostry、Loungani和Berg对全球化、不平等和经济增长进行了最好的实证研究。这本书不仅汇集了各方的工作，而且还为包容性增长制定了丰富的政策议程。每个想要了解我们经济未来的人的书架上都应该有这么一本书。”

——Dani Rodrik，哈佛大学

“Ostry、Loungani和Berg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以简洁易懂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不平等如何损害经济增长和稳定，以及如何制定政策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Heather Boushey，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执行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必须从只评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转向评估其对增长和不平等的影响……这本书便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Olivier Blanchard，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这是对我们所了解的不平等以及如何减少不平等的有力而简洁的总结。”

——Jeffry Frieden，哈佛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UP.COLUMBIA.EDU • CUPBLOG.ORG

值得被铭记的女性

新版10元加币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格伦·戈特斯里格

1946年，一位事业成功的黑人女商人因拒绝离开仅限白人进入的电影院而被囚禁、定罪并处以罚款。当地浸礼会领袖介入此事，为其提供帮助。他们向法院提出上诉，但最终败诉。60年后，政府对此进行道歉并给予当事人死后赦免，试图纠正错误。

这是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事吗？不。

虽然这让我们联想到那些发生在19世纪早期更遥远南方的事，不过这件事确是发生在加拿大东海岸的新斯科舍省。

维奥拉·戴斯蒙德 (Viola Desmond) 和她的

案子成为全加拿大追求种族平等的启蒙。如今她的肖像出现在10加元钞票上，以见证这个在加拿大历史上曾被忽略但却值得铭记的时刻。

作为加拿大的首个竖版钞票，新版的10加元钞票增加了防伪功能，不仅易于检查，而且难以伪造，包括：

- 鹰羽可变色，从金色变为绿色；
- 多处图案凸起；
- 巨大透明窗户内和四周有细致的金属图案，包括国会图书馆的拱形穹顶天花板、枫叶以及加拿大国旗和国徽。

独特的流程

2014年，加拿大央行对其塑料钞票图案元素的

选择和设计流程进行了审查。其结果是，央行就新版钞票的主题、主旨和图案在全加拿大展开更加公开和广泛的咨询。

2018年11月，印有戴斯蒙德肖像的新版10加元纸币正式发行。加拿大央行行长斯蒂芬·波罗兹 (Stephen Poloz) 在描述这一新流程的初期阶段时说道：“财政部长比尔·莫诺 (Bill Morneau) 和我都认为加拿大一直有在日常流通货币上印上加拿大标志性女性肖像的传统。因此，我们向公众发出邀请，让他们来告诉我们应该用哪位女士的肖像。最终，获得提名的女性超过了2.5万人。”

在这些被提名人选中有461名符合资格的候选人。一个独立的咨询委员会将这一名单删减至12人，并展开民意调查，以将加拿大民众的意见纳入其中。90%的受访者对这12位女性都无异议。随后，历史学家帮助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包含5名候选人的短名单，并通过焦点小组 (focus group) 的形式获得普通加拿大人对这5名候选人的意见。该名单获得了批准并提交给央行，央行行长就此与财政部长进行沟通和磋商。根据《加拿大银行法案》，由财政部长做出最终的决定。

波罗兹说：“钞票不仅是加拿大人可以放心使用的一种安全的支付手段，它还展现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如今，每当我们使用这一新的竖版10加元钞票时，它都在提醒我们要在加拿大继续追求人权和社会正义。”

是时候改变了

1946年的一天，戴斯蒙德来到电影院买电影票，售票员卖给她的是位于楼上的通常提供给有色人种的座位票。由于近视，并且没有留意到这个规定，戴斯蒙德来到正厅坐下，以便更靠近银幕。检票员发现她的票是楼上的座位票，于是她返回售票处，想要买一张正厅座位票，但是售票员拒



照片：BANK OF CANADA

新版10加元钞票是加拿大发行的首个竖版钞票，其上印有杰出人物维奥拉·戴斯蒙德的肖像，这与之前发行的塑料钞票不同。



绝了她。当意识到自己是由于种族的原因而被拒绝的时候，戴斯蒙德毅然决然地来到正厅坐下。随后，有人报警叫来了警察，将她强行带出电影院。在此过程中，她的臀部受伤，之后被监禁了12小时，并且还支付了20加元的罚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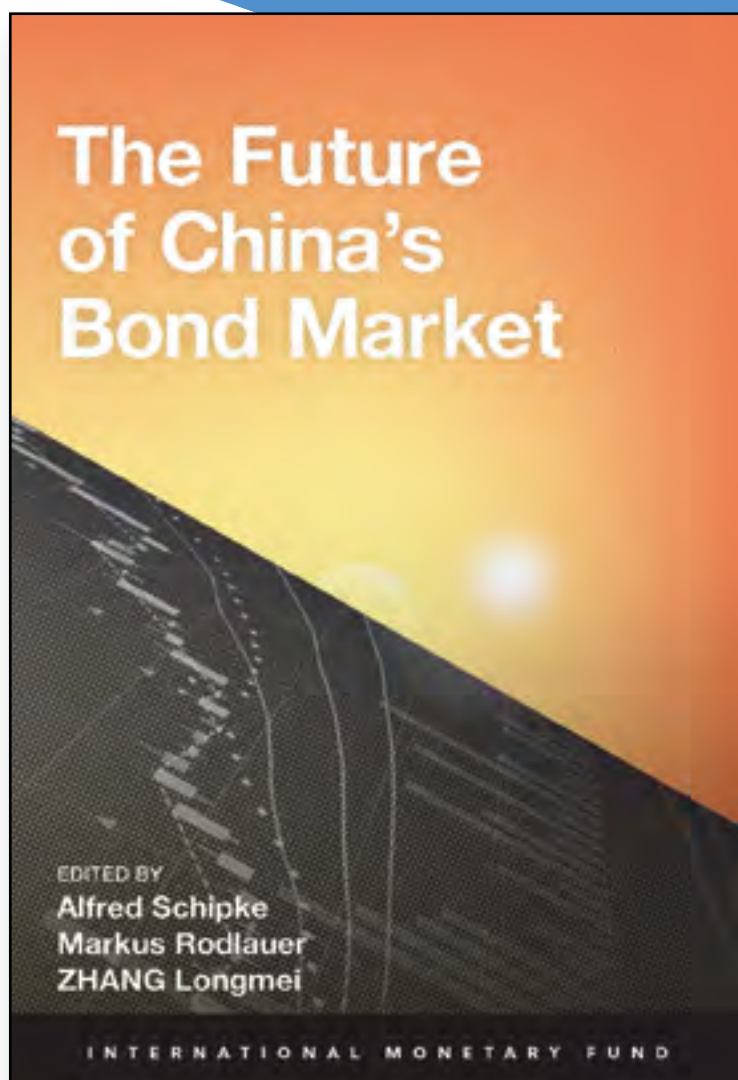
虽然当时新斯科舍省没有法律要求强制实行种族隔离，但是法院也并未对酒店、影院和餐馆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合法性给出裁决。由于一张价值20分的楼厅电影票的税是2分，而一张价值40分的正厅电影票的税是3分，最终戴斯蒙德被裁定逃税1分。

“1946年维奥拉·戴斯蒙德勇于对抗不公平的行为推动了加拿大的平等和社会公正运动。”财政部政务次官詹妮弗·奥康奈尔（Jennifer O’Connell）在新版10加元钞票发布会这样说道，“70多年过去了，她是第一位出现在日常流通

10加元钞票背面的图案包括全世界第一个人权博物馆——加拿大人权博物馆，代表加拿大一直在追求权利与自由。

货币上的加拿大女性，我们以此来纪念她，希望她的事迹能够激励下一代加拿大人继续追随她的脚步。”^[D]

格伦·戈特斯里格（GLENN GOTTSSELIG）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中国债券市场的未来

“中国债券市场非常庞大且重要，以至于不容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忽视和误解。如今，这本书的出现让大家没有借口去忽视和误解。”

——BARRY EICHENGREEN，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bookstore.imf.org

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2019



MFICA2019001